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每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四月三日 ·售價三萬元·

第四卷 第六期

專論
論當前的土地問題 笪移今
釋Liberal·Liberalism 鄭愼山
論皇權 吳晗

美國通信
儼然又是第二個暴風雨的前夕 楊慶堃

生活與文化
論神秘思想——神秘的邏輯 張述祖

觀察通信
土地改革·地道戰 觀察記者
宜川之役的檢討 觀察特約記者
法幣出關與流通券貶值所激起的波浪 觀察讀者投寄
國代和立委的選舉糾紛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閒欄
悼許季茀先生 吳世昌

文藝
包華麗夫人逝世一百年 凌卓

關于觀察叢書的報告 編者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二十五萬
掛號：三十萬元
航平：三十六萬
航掛：四十萬元
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售價：每册三十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十一萬
掛航每册十一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三千萬元
普通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¼面 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關於觀察叢書的報告

叢書預約截止・預約成績良好

本社第一批叢書預約，已於三月三十一日截止，凡是四月一日以後收到的預約信件，不再登記。我們這次發行預約，從二月八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前後有五十多天，我們已經給予讀者充份的時間使預約信件可以在我們截止日期以前收到，所以凡是在四月一日以後到達的預約信件，即不再接受，希望讀者原諒。

這次預約的成績，超過我們的預期很多。這次本是我們第一次出版叢書，一切都帶一點嘗試的性質。我們也不知道每本書到底可以預約出去多少。我們希望每本書能預約出去五百册，至少也有三百册。因爲我們聽說別家出版社發行預約，總在三五百册上下。但是預約的結果超出我們的希望。各書預約的詳細字數，今天（三月廿九日）還不能報告，因爲各書的分類賬要到預約截止後始能確切結算。但在發行預約的六本書中（張東蓀先生的一本因爲中止預約，故不計入），有兩本大約可能超過一千三百册（唯物史觀精解・鄉土中國），有一本可能達到一千册（英人法人中國人），有一本可能超過八百册（政學罪言），另兩本可能超過七百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論雅俗共賞）。後兩本預約數目較少的原因，是因爲在目前這個動盪的局面下，出版界一般的情形都是論政治論思想的書銷得多，論文化論文藝的書銷得少。潘先生一書則因在第一批的七册中，預約價最大，所以佔第四位。

預約越多・虧賠越大

我們這次叢書的預約，大賠其本。預約的成績雖然使我們興奮，但在業務上，却是預約越多，虧賠越大。我們開始發行預約，尚在陰曆年底之前，那時的紙價在一百七八十萬一令之數，我們的成本是照二百萬元一令之數計算的。不料陰曆年關一過，紙價逐日上跳，二百幾十萬、三百幾十萬、四百幾十萬、五百幾十萬、一度跳到六百萬大關。紙價這樣瘋狂上跳，確實出乎我們的意外。預約的目的本想先收一筆現款，預先買紙。但是我們發行預約雖然是從二月八日開始的，而大多數的預約信件，都是在三月初旬來的。在二月底時，紙價已跳到三百萬元以上，在三月五日至十五日之間，紙價又自三百幾十萬跳到五百幾十萬，所以我們這次非常不巧，完全沒有能夠運用這筆款子。紙價一天一天跳，明知預約就是賠錢，但是爲了信用，又不能中止。所以越是預約得多，越賠得多。舉例言之，在四月份出版的三本書，「政學罪言」要售二十餘萬元，但預約祇收八萬元，「鄉土中國」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可能要售十二萬元，但預約祇收三萬八千元（大多數都是在三月十日前預約的），這樣一比，讀者就知道我們虧賠的程度了。

叢書排印情形

四月份出版的三本：「鄉土中國」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書都已打好紙型，「政學罪言」已完全排好，日內即可打紙型。現在封面還在製鋅版，這三本書大概在四月十日左右可以印好，再加上裝訂的時間，如無其他意外，這三本書在四月二十日可以正式出版。請讀者注意四卷八期或九期本刊上的廣告。

五月份出版的三本：「論雅俗共賞」已排好一半，「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已開始付排。吳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觀精解」尚未脫稿，據吳先生復信，四月中旬可以脫稿，我們希望四月下旬亦可付排。

張東蓀先生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我們前次因爲張先生脫稿有待，故中止預約，據張先生說，太約六月可以脫稿，我們希望張先生這本書能在七月出版。同時，觀察叢書第二批業已編定，可能在六月中發行預約（尚未最後決定），屆時張先生這書本當再參加第二批叢書的預約，補行預約。

關於叢書的封面設計，很雅緻，是在投稿中錄用的。關於叢書的封面紙，我們前次宣佈，決定用最好的紙。目前一般出版品的封面紙都是用的八十磅或一百磅的木造紙，我們上次買的是二百磅木造紙，可以說是太好了。但是我們很抱歉，我們現在不能再用這樣好的封面紙了，因爲我們虧賠太重，我們不得不減輕封面紙的成本。按照目前市價，照二百磅的木造紙計算，每一本書的封面紙，就要化到二萬元。讀者試想，譬如一本「論俗雅共賞，」預約祇收三萬五千元，而一張封面的成本倒要二萬元，未免使我們負担太重了，所以我們現在改用一百二十磅或一百四十磅的木造紙，比原來的差一點，但仍較一般出版品的封面紙張好一點。還請讀者原諒我們的苦處。

失敗與教訓

這次我們在業務上的失敗，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預約的日期拉得太長，而物價的上跳又出乎常情。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將預約的日期定得這樣久呢？我們原來的意思，是希望讓遠邊如西康、青海及滇西一帶的讀者也有機會來函預約，因爲假如預約日期祇限半個月，則可能遠地的讀者收到本刊，知道叢書預約時，已過了半個月了。我們覺得我們對於遠地的讀者，也應當注意到他們的權利。然而結果呢？近地的讀者也都挨到預約快截止的時候才來預約，以致預約的價格，很早很早就定了，物價波動而預約價不能改動，到收到預約款時，實際上就變成多預約一本多賠一份了！下次預約時，我們勢須修正我們的辦法了。

其次，我們這次在處理預約函件的效率上，的確太慢，很對不起讀者。原因是信件在驟然之間來得太擠，以致原來的人手簡直無法應付，我們曾有幾天，有五個職員同時趕，結果還是趕不完。現在我們希望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收到的預約信件，在四月五日前後都能夠一一登記完畢。我們在此再度向讀者表示歉意。（編者）

本刊自本期起 每份售三萬元

讀者先生：本刊自本期起，每份售三萬元。我們上次在四卷三期付印時，報告紙價跳到四百萬，其實在四卷三期出版時，紙價已跳到五百萬了。後來紙價又一度冲到六百萬。但是刊物總不好意思期期漲價，所以在四卷四期出版時，我們極度焦慮。我們這幾家民營雜誌業，曾在半個月以前，在四天之內集議三次，討論我們所面臨的幾乎瀕近崩潰的危機，這也可以反映雜誌業的經營已經困難到如何程度。我們這一期的紙就是以五百四十五萬一令之數購進的。排印工在上月漲了六成，裝訂漲了八成。由於生活指數的增加，下星期又要加價了。員工的薪金也須調整，一切開支均在增加之中，所以我們的售價也不得不比例的增加一點。

我們一方面在業務上不得不加價，一方面仍願顧到讀者的負担，因之我們決定，訂閱的價目這一期暫時不加。讀者如欲減輕負担，如欲避免漲價，即請直接定閱。同時我們聲明，以後讀者訂閱本刊或購買叢書，均以信件到達本社時的門市價目爲標準。所以讀者如欲享受低廉定閱的機會，務請即日惠函訂閱。在下星期五以前收到的訂閱函件，仍照舊價計算（編者）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六期

三十七年四月三日

本期作者

笪移今：上海銀行經濟研究專員
鄭愼山：
吳　晗：淸華大學教授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張述祖：國立師範學院副教授
吳世昌：牛津大學講學
凌　卓：

論當前的土地問題

笪移今

自中共公布「土地法大綱」，作為爭取農民、組織農民、擴大農村階級的鬥爭以來，關於如何處理農村中的土地所有權、如何制定農民政策以對付農民，確是當局最感棘手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全國人民非常關切的一件大事。一切統計材料和專家觀察，一切農民運動的經驗和革命教訓，都證明土地問題，是中國最根本最主要的問題。孫中山先生說：「要想革命完全成功，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見「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演說詞）。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存在，乃是今日中國經濟衰落政治腐敗的基因，乃是當前國內紛爭戰亂的根源。

從歷史上看，土地問題之被認為必須解決，封建地主之被認為必須剷除，還是伴隨工業革命，伴隨資本主義，伴隨近代民主運動而俱來的。在歐洲，當各國新興工商階級，為反抗阻撓工商進步的舊勢力，為爭取企業的自由發展，曾經鼓勵並領導過農民共同對封建制度作戰，取得勝利，建立民主政治，或多或少的執行了土地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大都是土地分配不均，農村破產，農民暴動的結果。祇因為生產關係沒有根本改變，舊封建統制被推翻以後，接着又產生了新封建地主，農民始終沒有獲得眞正的永久的解放。孫中山先生受了歐洲政治影響，認識土地分配問題的嚴重，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早在同盟會時期（一九〇五年），即將「平均地權」列為四大政綱之一。民國十三年更進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號召農民參加革命，完全是正確而合乎歷史發展的。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為什麼要重視土地改革呢？第一是為了增加生產，孫先生說得最為明白：「農民耕田所得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假如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是一定更高興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見民生主義講演）。土地問題不解決，就不能鼓勵農民的生產情緒，農業生產便不會提高。第二是為了安定農村，封建性的超經濟剝削，使佃農與地主的對立關係，愈益惡化。一部份自耕農也因受高利貸及捐稅壓迫，不斷地淪落為佃農貧農，其境遇亦和佃農不相上下。終歲刻苦勤勞，尚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迫不得已，除少數轉入都市充當苦力外，其餘只有冒險為匪，以搶掠為生，造成農村社會普遍的不安。只有實行土地改革，才能從根消除這種動亂於永恒。第三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中國農民生活之苦，舉世罕見。地權平均之後，農民感到自己有田，當然肯努力耕作，收入隨之可以增加，購買力因之可以提高，工業品的市場可以擴大，間接又可以推動工業化的進展。第四是為了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欲求民主政治眞正實現，必須爭取農民的支持。欲使農民對政治發生興趣，首先就要為農民解除經濟上的壓迫，就要把多數農民從封建的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分得足夠耕種的土地。所以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促進經濟工業化的必要手段。換句話說，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束縛了土地生產力，損害了工商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是中國建設過程中最大的敵人，應該毫不容情予以澈底改革，這是我們對於土地問題的一個基本認識。

由於中國封建土地制的形式，表面上多少與歐洲有一點小異，便有人認為中國土地不均的程度極微，認為土地改革不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這顯然是不科學而極有害的見解。據陶直夫氏的調查，在抗戰前，我國全部耕地中約有百分之六十八集中在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手裏，佔全部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農、貧農、佃農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全國耕地。自抗戰以來，地權集中和農民破產的情形，比戰前更為劇烈。據農業促進委員會的調查，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這短短的五年中，四川地主所佔農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六十九增至百分之七十，西康由百分之六十九增至百分之七十三

。又據中國農業研究所調查，後方十五省，在民國二十五年佃農及半佃農平均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五，至三十年增至百分之六十七，至三十二年更增至百分之七十五。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今日土地問題已嚴重到何種程度。而數十年來兵亂，以及農業減產現象（這可從民國以來糧食輸入逐年增加的情勢推知），不能說不是由於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必然後果（當然此與帝國主義侵略亦有關係）。

土地制度既是刻不容緩的需要改革，那麼，我們究應採取怎樣的途徑呢？就理論來說，改革土地的辦法：（一）稅去地主，以土地累進稅的方法，逐漸使地主放棄土地；（二）買去地主，以貨幣或債券收購地主的土地；（三）賜去地主，以政治力量無條件的沒收地主土地；（四）平分土地，按鄉村人口（包括地主在內）平均分配。這四項方法中，第一種迂迴緩慢，一時很難見效。第二種辦法，須要一筆龐大的支出，政府實在不易籌措。如果發行土地債券，縱然地主願意承銷，但在農民方面，除納田賦外，若干年內須繳付地價，負担未見減輕，無力改良經營，生產不能增加，此與土地改革的本旨相距甚遠。第三種辦法沒有顧及到地主生活，失之偏激，且也不太近人情。因此，只有第四種平分土地的辦法較爲合理而易行。實行平分土地之後，農民只須向政府繳納地稅，無須償付地價，生活頗有改善的希望，並可利用經濟餘力，從事改進耕作。不過中國地廣，各區域地權集中的情形複雜，並且地主的形成亦各不同，由强取霸佔而成地主者有之，由憑藉政治勢力豪奪而成地主者有之，由以高利貸剝削而轉爲地主者有之，由勤勞儉樸而成地主者亦有之。同時地主的爲人風度，以及對待農民寬厚與刻薄也各有程度上的不同。在土地改革進程中，對付各種地主應否採取差別態度，似乎也有斟酌的餘地。在實行平分土地之後，對於少數比較良善的地主，如有因勞力不足而陷於無法維持生活時，似可參照當地多數農民的意見，由政府視實際情形，酌予補助。其次，各地農村階級構成的比重不同，在處理土地問題時，應絕對尊重多數意見，凡是佃農比重大的地方，應以佃農利益爲中心；僱農比重大的地方，應以僱農利益爲中心：自耕農比重大的地方，應以自耕農利益爲中心。在地權分配比較平均的地區，如果多數農民不願變更現存土地狀態，那麼除對地主土地予以處理而外，就可不必進行再分配。自耕農的數目，在中國一般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實施土地改革時，應儘量避免侵害他們的利益。對自耕農讓步，對自耕農進行教育，爭取自耕農同情土地改革，乃是保證平分土地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這是我們對於土地問題的一個基本態度。

國民黨標榜土地綱領，已經有四十三年的歷史，國民黨掌握政權亦有二十二年的時光。歷次會議宣言及決議案中，都不斷地提到土地改革。遠且不說，三十四年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政策政綱，會規定都市土地一律收歸公有，農地除公營者外，應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實行耕者有其田，凡非自耕之土地，概由國家發行土地債券，逐步徵購並分配之。三十五年十月又公佈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規定綏靖區內之耕地，其所有人爲自耕農者，依原有證件收回自耕。其所有權人非自耕農時，在政府未依法處理前，准持憑證件保留其所有權，並由現耕農民繼續佃耕，租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收復前農民欠繳之佃租，一概免予追繳。地主失縱或無法恢復原狀的土地，由縣政府以土地債券徵收後給農民按價承領自耕。本年三月中在南京召開的華中綏靖會議，又通過了一個「新土地法」，其具體內容，迄未詳細公佈，據路透社所傳：（一）綏靖區之地主，不論其土地曾否被非法分配，每人一律祇准有土地五畝，超過之數完全由政府徵收。佃農每人亦可得五畝，至自耕農所有土地，則不受此限制；（二）現役軍人每人平均可得田三畝至五畝；（三）佃農所繳租米，改爲三一制，即收穫量的三分之一。

分析這些辦法，六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政策，尚不失爲是一進步的措施，可惜絲毫未見付之實行。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表面上似乎相當顧及現實，但承認地主保留所有權，本質上是在變亂之後，對地主權益加上一層法律的保護而已。至於發行土地債券，因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不見得有若何成效。華中綏靖會議新訂的土地法，就已經知道的要點看，是政治意義超過經濟作用，比之過去辦法雖有顯著的改變，但因環境困難和行政效率的關係，還不敢存有過高的奢望。抗戰結束後，政府土地政策的重點，只注意到綏靖區，而忽略了其他地方，是不是非綏靖區的土地問題不值得重視，不須要改革呢？而且「對於收復共區的土地處理問題，仍是富於粉飾敷衍的色彩」（國民黨學術團體——地政學會負責人萬國鼎語，見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大公報）。政府這種不健全的態度，實在令人費解。「政府二十年來未能切實解決我國土地問題，不能不說是國民黨執政的一大失策。推其原故，或因國民黨的構成份子中，比較複雜，或有若干封建勢力的大地主隱伏其間，從中作梗」（見三月二十二日申報社論）。一未實行孫中山先生所主張之耕者有其田，於是縱容地主階級，以維持最惡劣之租佃制度，且將各級地方政權與民意機關，乃至社會經濟力量落諸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官僚集團——之手（見三月二十七日南京四十七教授宣言）。最近南京中央周刊召集過一次座談會，席間對現政權的性質解析得最爲透澈：萬國鼎說，現在各級機構的民意代表們大多與地主階級有瓜葛，各級行政機關的主管人員也往往是地主階級。中央政治大學教授張丕介說，各地民意機關大多操之地主階級手裏。另一教授說，下級黨部更爲新的士紳所把持，在地方爭名奪利，作威作福。這批人物比大革命前的土豪劣紳更壞，舊土豪劣紳還有一點舊道德觀念，而他們却連舊道德也沒有，巧取豪奪，兼併了耕者的土地，成了新興的地主（參看中央周刊第十卷第十一期）。這些擁護國民黨的報紙和學者，說明了反對土地改革的是些什麼人，以及政府爲何沒有認眞執行土地改革的關鍵所在，極爲精到得體。這也可算是我們對於未能解決土地問題的原因的一個看法。

可是，正當土地問題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熱心國事的學者們挺身發言了

。首先就是三月一日在北平成立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其三十二條基本主張中有一條：「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爲最終目標，第一步應即規定私人農地的最高限度，超過此限度者，應立即收歸國有。對於原來地主給以長期債券，以爲補償。收歸國有的農地，或租與自耕農，或集體經營，視情形而定。市地應立即收歸國有，並酌予補償」。其次就是國民黨的社會團體——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於三月二十日發表了「土地改革方案」，主張全國農耕地應自即日起一律歸現耕農民所有。化佃農爲自耕農，現在佃耕他人土地之農民，分年清償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組織佃農協會，推進土地改革，代爲辦理土地登記，收繳地價。這兩個團體的土地意見，有一主要共同核心，即以債券換取地主土地，中心目的是在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不過就土地債券在綏靖區推行的成績看，大有此路不通之感，使得「買去地主」論者重加考慮的。至於兩派的異點，前者標出土地國有字句，確很動人，當會博得過左份子的迷戀。然而，當今有許多團體，往往以極左的經濟主張掩飾其極右的經濟行動；我們相信社會經濟研究會該不是如此。後者主張組織佃農協會，推進土地改革，這是方案中的特色。不過佃農每年須繳地價，地主在實際上仍是農村中的經濟支配者，佃農經濟地位，沒有顯著的改善，則佃農協會恐怕易於被地主利用，作爲壓迫農民的工具。

康德說，沒有實際的理想是空的。關於解決中國土地問題，應該針對實際・在農村中以民主方式組織農會，剷除地主的潛在勢力，自下而上的推動土地改革。今天土地鬥爭的形勢，已達到極嚴重的階段，對於地主的利益，似已到了無法且也無暇顧及的關頭。這是我們對於民主土地改革方案的一個老實意見。

最後，必得鄭重指出：土地問題固然是根本問題，須要解決。但目下還有一個比這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立刻減輕業已達到忍受極度的農村負担，而讓農民能夠勉強活下去。在農民不能活下去的慘境下，縱然分得了土地，沒有種籽，沒有農具，沒有人力，這又怎麼辦？所以目下一切的殘民之事，是萬萬再做不得的了。

釋 Liberal·Liberlism

鄭慎山

近來大家討論自由主義，我總覺得「自由主義」這個名詞的本身有問題。我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

有許多外國名詞，意義非常空泛（loose），在一字之後，加上了 ism 的語尾，并不一定成爲一種「主義」。liberalism 一字即是這一類；牠并沒有中文「自由主義」那樣嚴重。依我的看法，牠并不是一種嚴格的「主義」。我想起章行嚴先生從前提倡過的音譯；如果我們把 liberalism 一字譯音而不譯爲「自由主義」，則一切的誤解，殆可避免不少。liberalism 這個字，是從 liberal 得來的。liberal 這個形容詞，譯做「自由」，根本錯誤。我隨手查了英國的牛津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和美國的標準字典(Standard Dictionary)，沒有看見把這個字釋作「自由」的簡單意義。這個字的要義有下列數種：

第一是度量大，胸襟大（標準字典釋爲 having a generous heart,broad……，牛津字典釋爲 open-handed），自然包括容忍的意思在內。第二是不偏狹(free from narrowness 見標準字典），無偏見 (unprejudiced 見牛津字典）。第三是進步的，獨立的（均見標準字典）。因此，凡抱 liberal 態度的人在政治上總是贊成民主（標準字典），主張民主的改革和廢除特權（牛津字典），在宗教上也不偏拘成見，爲教義所拘束（標準字典）。總之 liberal 的反面，是度量小、偏狹、有偏見、頑固、死硬、保守等。

讀者或以爲上面所述太粗淺了，可是有許多無謂的議論和錯誤的思想，都在那極粗淺的地方沒有弄清楚的結果。誤認 liberal 爲「自由」，而對於「自由主義」的譯名，就望文生義，則討論愈多，離題愈遠。我們明白了上述的意義，就知道英美人對於 liberal 這個字的用法了。例如英國有所謂「自由保守派」(liberal conservative) 者，即指對於改革不生惡感之保守黨員而言。馬歇爾聲明中所指國共兩黨都有 liberals，即是指國共兩黨中都有度量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之人而言；他們正是與國共兩黨的死硬派 (diehards) 相對照。馬歇爾所說的國共兩黨的 liberals，絕不是指國共兩黨中有放棄其黨義黨綱的人而言。馬歇爾聲明中所指國共兩黨以外的 liberals，也是指那些度量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之人而言。因此，馬歇爾聲明中所用的 liberals，并無嚴重的特殊意義，他不過是本着英文的習慣，用了一個與死硬派相對的名詞而已。

本來我是從 liberal 這個形容詞說起的，上面引到馬歇爾聲明所用的 liberals，乃已轉入名詞了。liberal 當名詞用（依俗譯，即是自由派或自由主義派），其意義是由形容詞引伸而來，例如我剛才對馬歇爾所用的liberals一字的解釋，自信大體不錯。這可說是 liberal 當名詞用的廣義解釋。liberal 當名詞用的狹義解釋，就是指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或行動自由的人或是指反對保守主義而并非激烈派的人，（見標準字典）。只有在這個狹義的解釋上，liberal 一字，方可勉強譯爲「自由派」或「自由主義者。」

由 Liberal 引伸出來的 liberalism 一字，是指那種度量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重改革的態度而言；這種態度固然尊重思想言論的自由，然其意義，并不側重在自由一方面。我們通稱爲「自由主義，」實在是勉強而又勉

強的。照這樣講，所謂「自由主義，」不過是一種對人對事的態度。態度寬大和進步一點的人，即是「自由主義者。」所以「自由主義」一名詞的本身，并不像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等名詞有一定的內容，乃是說明一種態度而已。我們若硬把「自由主義」當着一種「主義」去討論，未免有點文不對題。

最近張東蓀先生發表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一文（見觀察第四卷第一期），我看了有幾點意見，順便提出，就正於張先生。

張先生說：「自由與自由主義，在涵義上不是完全相同。」我不僅同意，並且願意更進一步說：自由（指 freedom, liberty 而言，張先生的意思亦復如此，因為他說：「其他別種主義者亦並沒有否定自由」）與自由主義簡直是兩件事。因為據我在前面的分析，自由主義並不是專談自由的一種主義。至於張先生把自由主義分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我不敢苟同。因為自由主義，依我前面所述，是度量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重改革的態度，既係如此，即無所謂政治上的或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我們只能說自由主義在政治的態度或主張怎樣，在文化上的態度或主張怎樣。張先生因為各國政黨中有自由黨或民主黨，就認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有「固定的內容」和「具體的主張」，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沒有這些，「只是一種態度。」殊不知自由主義是一事，自由黨或民主黨。又是一事。世界上固然有根據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如英國的自由黨是)，也有根據保守主義的自由黨（如今日日本的自由黨是）。所謂「具體的主張」，大概是指自由黨的政策而言。至於「固定的內容」，就自由黨而言，并不固定。以前英國自由黨的政策，與今日英國保守黨的政策實差不多；今日英國自由黨的政策，與以前英國勞工黨的政策也很接近。依張先生所說，美國的民主黨，原是代表自由主義的，然而現在美國代表自由主義的政黨，乃是華萊士一派反民主黨的人所組織的新黨。我不很同意張先生的關於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的這個分類。

此外，張先生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在今天廿世紀已是過去了。」這話我也不同意。這是因為張先生把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二字看做 freedom, liberty，而沒有把牠看做 liberal 。所以他說：「所謂政治的自由主義，就是單純的自由主義，亦可以稱之為舊式的自由主義。」究竟「單純的自由主義」或「舊式的自由主義」又是什麼，張先生沒有說明。就他論歐洲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一段看，張先生大概是指個人主義而言。不知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雖不無聯帶關係，然竟究是兩件事，不是一件事。今日稍有常識的人的確都知道「個人主義」早已過去了；至於自由主義，實在沒有過去。例如去年英國牛津大學還舉行一次國際自由主義大會，并發表一篇自由主義宣言。美國華萊士一派人還在組織政黨。張先生雖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已成過去」，然同時極力推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張先生這一個矛盾，是由於將「自由主義」的「自由」二字，認為普通的自由二字了。至於其他論者之望文生義，更無待論。例如有些人以為中國今日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必倡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必倡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者應贊成民主政治，是無待言的；至於自由主義者是否必贊成社會主義，就成問題了。贊成中國採行社會主義是一件事；自由主義者是否必贊成之，是另一件事。我以為凡贊成社會主義者，就應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不必再掛自由主義的招牌了。

寫到這裏，讀了潘光旦先生的「讀自由主義宣言」（觀察第四卷第三期），我覺得這篇文章是近來論自由主義的一篇比較有價值的文章。因潘先生論到「主義」兩字的名稱，并說：「西文 liberalism 一字的尾閭即我們所稱主義也者，雖若比較平凡，其所得於情操的渲染者，也不若我們的譯名的濃厚」。這與我前面所說 liberalism 沒有中文「自由主義」那樣嚴重的意思相同。總之，我認為 liberalism 一字的普通意義，不過是指度量大、能容忍、不偏狹、無偏見、重改革的態度而已。本文的目的，僅在說明這一點，至於其他的問題，如民主政治問題和社會主義問題等，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了。

論皇權

半年來費孝通先生在着手研究中國社會結構問題，發表了許多篇關於皇權紳權的論文，很引起我的興趣。在寒假中，我也參加了他所主持的關於社會史的討論會，交換了許多意見。雖然我和孝通先生的看法不盡相同，不過，我確認為他所提出的問題是極為重要的，在學術討論的場合上，儘可見仁見智，各就所知，提出商榷。最近，孝通先生又特別勸我把和他不同的看法寫出來，讓大家都有機會來參加這討論，這意思是極好的，為了有系統地說明個別的問題，本篇的討論以皇權的一部份問題為中心。希望讀者和孝通先生多多指教。

吳晗

誰在治天下？

在論社會結構裏所指的皇權，照我的理解應該是治權。歷史上的治權不是由於人民的同意委托，而是由於憑藉武力的攫取、獨佔、也許我所用的「歷史」兩個字有語病，率直一點說，應該修正為「今天以前」。我的意思是說，在今天以前，任何，任何朝代任何形式的治權，都是片面形成的，絕對沒有經過人民的任何形式的同意。

假如把治權的形式分期來說明，秦以前是貴族專政，秦以後是皇帝獨裁，最近幾十年是軍閥獨裁。皇權這一名詞的應用，限於第二時期，時間的意義是從元前二二一到公元一九一一，有兩千一百多年的歷史。

皇權是今天以前治權的形式的一種，統治人民的時間最長，所加於人民的禍害最久，阻礙社會進展的影響最大，雖今天最近，因之，在現實社會裏，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毒素中的也最深。例子多得很，袁世凱不是在臨死以前，還要過八十三天的皇帝癮嗎？溥儀不是在遜位之後，還在宮中作他的皇帝，從來又跑到東北，在日人卵翼之下，建立僞滿洲國，作了幾年的康德皇帝嗎？不是一直到今天，鄉下人還在盼望眞命天子坐龍庭，少數的城裏人也還在想步袁世凱的覆轍嗎？

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無論是貴族專政，是皇帝獨裁，是軍閥獨裁，都是以家族作單位來統治的，都是以血統的關係來決定繼承的原則的。一家的家長（宗主）是統治權的代表人，這一家族的榮辱升沉，廢興成敗，一切的運命決定於這一個代表人的成敗。在隋代有一個笑話，說是某地的一個地主，想作皇帝，招兵買馬，穿了龍袍，佔了一兩個城市，戰敗被俘，在臨刑時，監斬官問他，你父親呢？說太上皇蒙塵在外。兄弟呢？征東將軍死於亂軍之中，征西將軍不知下落。他的老婆在旁罵：「都是這張嘴，鬧到如此下場！」他說：「皇后，崩即崩耳，世上豈有萬年天子？」說完伸脖子挨刀，倒也慷慨。這一個歷史故事指出爲了作幾天、作一兩個城市的皇帝，有人願意付出一家子生命的代價。爲了這一家子的皇權迷戀，又不知道有幾百千家被毀滅、屠殺。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流氓劉邦，强盜朱溫，流氓兼强盜的朱元璋，作了皇帝，建立皇朝以後，史書上不都是太祖高皇帝嗎？諡法不都有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或者類此的極人類好德性的字眼嗎？黃巢李自成呢？失敗了，是盜、是賊、是匪、是寇，儘管他們也作過皇帝。舊史家是勢利的。不過也說明了一點，在舊史家的傳統概念裏，軍事的成敗決定皇權的興廢，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皇帝執行片面的治權，他代表着家族的利益，但是，並不代表家族執行統治。換言之，這個治權，不但就被治者說是片面强制的，即就治者集團說，也是獨佔的、片面的。即使是皇后、皇太子、皇兄皇弟、甚至太上皇、太上皇后，就對皇帝的政治地位而論，都是臣民，對於如何統治是不許參加意見的；一句話，在家庭裏，皇帝也是獨裁者。正面的例子，如劉邦作了皇帝，他老太爺依然是平民，叨了人的教，讓劉邦想起，才尊爲太上皇，除了過舒服日子以外，什麼事也管不着。反面的例子，石虎的幾個兒子過問政事，一個個被石虎所殺。李唐創業是李世民的功勞，雖然捧他父親李淵作了些年皇帝，末了還是來一手逼宮，殺兄屠弟，硬把老頭子擠下寶座。又如武則天要作皇帝，殺兒子、殺本家，一點也不容情。宋朝的基業是趙匡胤打的，兄弟趙匡義也有功勞，趙匡胤作皇帝年代太久了，「燭影斧聲」，趙匡義以弟繼兄。後來趙匡胤的長子德昭，在北征後請皇帝行賞，也只是一個建議而已，匡義大怒說，等你作皇帝，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一句話逼得德昭只好自殺。從這些例子，可以充分說明皇權的獨佔性和片面性。權力的佔有慾超越了家庭的感情，造成了無量數骨肉相殘的史例。

皇帝不和他的家人共治天下，那末，到底和誰共治呢？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可以答覆這個問題，和皇帝治天下的是士大夫。故事的出處是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

> 熙寧四年（公元一〇七一）三月戊子，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爲非，亦自有以爲當更張者。」

這故事的有意義，在於第一，辯論的兩方都同意，皇權的運用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文彥博所說的失人心，宋神宗承認是於士大夫誠多不悅，人心指的是士大夫的心。第三，文彥博再逼緊了，宋神宗就說士大夫也有替成新法的，不是全體反對。總之，儘管雙方對於如何鞏固皇權——即保守的繼承傳統制度或改革的採用新政策——的方案有所歧異，但是，對於皇權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決非百姓的利益，這一基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那末，爲什麼皇帝不與家人治天下，反而與無血統關係的外姓人士大夫治天下呢？理由是家人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婦，假如與皇帝治天下的話，會危害到皇權的獨佔性、片面性，「太阿倒持」是萬萬不可以的。其次，士大夫是幫閑的一羣，是食客，他們的利害和皇權是一致的，生殺予奪之權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鷹犬，六轡在握，驅使自如，士大夫願爲皇權所用，又爲什麼不用。而且，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馬上政府是不存在的。治天下得用官僚，官僚非士大夫不可，這道理不是極爲明白嗎？

士大夫治天下也就是社會結構裏的紳權，這問題留在論紳權時再說。

皇權有約束嗎？

皇權有沒有被約束呢？費孝通先生說有兩道防線，一道是無爲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一道是紳權的緩衝，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自下上達的作用上，紳權有他的重要性。（這條防線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於此，我們來討論費孝通先生所指的第一道防線。

假如費先生所指的無爲政治的意義，即是上文所引的文彥博的話：「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因承祖先的辦法，不求有利，但求無弊，保守傳統的政治原則，我是可以同意的。或者如另一例子，漢書曹參傳說他從蓋公學黃老治術，相齊九年，大稱賢相，蕭何死，代爲相國，一切事務，無所變更，都照蕭何的老辦法做，擇郡國吏謹厚長者作丞相史，有人勸他作事，就請其喝酒，醉了完事。漢惠帝怪他不治事，他就問：「你可比你父親强？」說：「差多了。」「那末，我跟蕭何呢？」「也似乎不如。」曹參說：「好了。既然他倆都

[illegible]主張[illegible]治，少管閑事，[illegible]老莊[illegible]，不是很好嗎？」這是無為政治典型的著例。這種思想，一直到十七世紀前期，像劉宗周黃道周一類的官僚學者，還時時以「法祖」這一名詞，來勸主子恪遵祖制。假如無為政治的定義是法祖，我也可以同意的。

成問題的是無為政治並不是使皇帝有權而無能的防線。相反，無為政治在官僚方面說，是官僚作官的護身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好官我自為之，民生利弊與我何干，因循、敷衍、顢頇、不負責任等等官僚作風，都從這一思想出發。一句話，無為政治即保守政治，農村社會的保守性、惰性，反映到現實政治，加上美麗的外衣，就是無為政治了。（關於這一點，無為政治和農業的關係，我在另一文章農業與政治上談到。）

在皇帝方面說，歷史上的政治術語是法祖。法祖的史例很多，一類如宋代的不殺士大夫，據說宋太祖立下遺囑「不殺士大夫。」從太祖以後，大臣廢逐，最重的是過嶺，即謫戍到嶺南去，沒有像漢朝那樣朝錯朝衣赴市，說殺就殺，不是下獄，就是強迫自裁，甚至如明代的皇言正刑西市。為什麼宋代特別優禮士大夫呢？因為宋代皇室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緣故。一類例如明代的東西廠和錦衣衛，兩個恐怖的特務機構，衛是明太祖創設的，廠則從明成祖開頭，這兩個機構作的孽太多了，配說禍「國」殃民，（這個「國」嚴格的譯文是皇權），反對的人很多，當然以士大夫為主體，因為士大夫也和平民一樣，在廠衛的淫威之下戰慄恐懼。可是在祖制的大帽子下，這兩個機構始終廢除不掉，到明代中期，士大夫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用祖制來打祖制，說是祖制提人（逮捕）必須有駕帖或精微批文（逮捕狀），如今廠衛任意捉人，鬧得人人自危，要求恢復祖制，提人得憑駕帖，這樣，兩個祖制打了駕，上大夫們在邏輯上已經放棄原來的立場，默認特務可以逮捕官民，只不過要有逮捕狀罷了。前一例因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優禮士大夫，政治上失寵失勢的不下獄，不殺頭，只是放逐到氣候風土特別壞的地方，讓他死在那裏。（宋代大臣過嶺生還的是例外）從而爭取士大夫的支持。後一例子，時代不同了，士大夫不再是夥計，而是奴才，要罵就罵，要打就打，廷杖啦、站籠啦、抽筋剝皮，諸般酷刑，應有盡有，明殺暗殺，情況不同，一落特務之手，決無昭雪之望，祖制反而成為殘殺士大夫的工具了。

從這類例子來看，無為政治——法祖并不是使皇權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從另一方面看，祖先的辦法，史例，有適合於提高或鞏固皇權的，歷代的皇帝往往以祖制的口實接受運用，反之，只要他願意作什麼，就不必管什麼祖宗不祖宗了。例如要加收田賦，要打內戰，要侵略邊境弱小民族，要蓋宮殿等等，一道詔書就行了。例如明武宗要南巡，士大夫們說不行，祖宗沒有到南邊去玩過，不聽，集體請願，大哭大鬧，明武宗發了火，叫都跪在宮外，再一頓板子，死的死，傷的傷，無為政治不靈了，年青皇帝還是到南邊去大玩了一趟。

那末，除祖宗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制度或辦法來約束或防止皇權的濫用呢？我過去曾經指出，第一有敬天的觀念，皇帝在理論上是天子，人世上沒有比他再富於威權的人，他作的事是不會錯，能指出他錯的只有比之更高的上帝。上帝怎麼來約束他的兒子呢？用天變來警告，例如日食山崩、海嘯、以及風、水、火災、疫癘之類都是。從洪範發展到諸史的五行志，從董仲舒的學說發展到劉向的災異論，天人合一，天災和人事相適應，士大夫們就利用這個來作政治失態的警告。但是，這著棋是不靈的，天變由你變之，壞事還是要做，歷史上雖然有在天變時，作皇帝的有易服避殿素食放囚，以至求直言的諸多紀載，也只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儀式而已，對實際政治是不能發生改變的。

第二是議的制度，有人以為兩漢以來，國有大事，由羣臣集議，博士儒生都可發表和政府當局相反的意見，以至明代的九卿集議，清代的王大臣集議，是庶政公之輿論，是皇權的約束。其實，並不如此。第一參加集議的都是官僚，都是士大夫。第二官高的發言的力量愈大。第三，集議的正反結論，最後還是取決於皇帝個人。第四，議只是皇權逃避責任的一種制度，例如清代雍正帝要殺他的兄弟，怕人說閑話，提出罪狀叫王大臣集議，目的達到了，殺兄弟的道德責任由王大臣集議而減輕。由此，與其說這制度是約束皇權的，毋寧說它是鞏固皇權的工具。

此外，如隋唐以來的門下封駁制度，台諫制度，在官僚機構裏，用官僚代表對皇帝的詔令的同意副署，來完成防止皇權濫用的現象，一切皇帝的命令都必需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核封駁，尚書施行的聯鎖行政制度，只存在於政治理論上，存在於個別事例上。所謂「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勅？」詔令不經過中書門下的，不發生法律效力，可是，說這話的人，指斥這手令（墨勅斜封）政治的人，就被這個手令所殺死，不正是對這個制度的現實諷制嗎？又如諫官，職務是對人主諫諍過舉，聽不聽是絕無保證的，傳說中龍逢比干諫而死，是不受諫的例，史書上的魏徵包拯直言盡諫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諫官的用意是為他好，有受諫的美名，其實，不受諫的史例更多。諫諍的目的都在維護政權的持續，說是忠君愛主，其實也就是要自己的官位財產，因為假如這個皇權垮了，他們這一集團的士大夫也必然同歸於盡也。

從上文的說明，所得到的結論，皇權的防線是不存在的。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會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

假如從另一角度來看，上文所說的這一些，也許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紳權的緩衝。不同的是我所指的這一些並不代表民間的願望，至多只能說是士大夫的願望，其方向也不是由下而上的，而是皇權運用的一面。這些約束不但不普遍，而且是常常無效的。

三月廿四日

儼然第二個暴風雨的前夕（美國通訊）

楊慶堃

華盛頓州立西部大學的畢業班，前幾天請言論界裏的斯提爾氏（E. A. Steel）到校演講原子彈問題，他說了一大篇教導青年學子的正經話之後，又叮囑聽衆，說這一代青年如果沒有和平的決心，而又想獲得性命的安全的話，唯一辦法是跑到沒有白人的地方去，而且還要快跑。斯提爾氏的警語，是針對着最近的歐洲局面而發的。

自從共產黨奪得了捷克政權，和蘇俄要求芬蘭改訂互助或同盟協定以後，美國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這兩個星期各方所發表的輿論，在右傾的方面是一片或明或暗的主戰腔調，在左傾的方面也充滿了戰事難免快來的恐懼心理。無論是左是右，這些論調叫人讀了聽了，都不免發生大禍將降的感覺。本文是想把美國最近對於東歐而發的幾種流傳最廣的見解，作簡短的報道，給讀者作辨認國際風雲的一個信號。

（一）右派極力張揚的惡夢

我們且從右傾方面說起。反俄論調素來不支吾半字的蔡爾德斯氏（Marquis Childs）在捷克政變發生後的第二天，就先聲疾呼，以蘇俄侵略野心的危險，和及早強硬對俄的必要，警告美國人。他說：「捷克事件以前，美京流行着一種逸裕自滿的感覺，覺得戰事縱使再來，也是遼遠的事——最快也要在五年至七年以後。這種感覺是根據多方面堅持了很久的觀點，認定蘇俄絕不想開戰。但這種感覺現在是幻滅了。這並不是因爲蘇俄現在忽然大改方針，眞想開戰，而是因爲蘇俄統治者的態度，使戰事爆發的可能性十分迫切。

「理由是這樣：蘇俄領袖們的心裏，有一套算盤，一面斷定美國一時不想再動兵戎，另一面又看透了美國在選舉年內，自相分裂，在外交政策上，處處投鼠忌器，不能採取斬釘截鐵的行動，蘇俄儘管放胆要什麼拿什麼，一時總沒有引起美俄戰爭的危險。但事實上，現在的危機和十年前的捷克危機，一樣的險惡。上次捷克被侵略後一年，大戰就爆發了，這次捷克政變後，恐怕不到一年，就會有戰禍，因爲第二個緊要關頭是四月十八日的意大利選舉，意國的共產黨到時如果能爭得靠近半數的選票，意大利就走上今日的捷克路上。意國一去，法國不會久存，法國一去，西歐就完了。從此，蘇俄就可以進行把北美洲封禁起來，斷絕它和世界的關係。」

四月十八日的意大利選舉，確是美國朝野都在彷惶疑忌的一個關頭，因爲照多方面的預料，意國的共產黨很有取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的希望，這希望倘成事實，下一屆的意國政府縱使不是共產黨佔多數，但再也不能將共產黨完全屏諸政權以外。所以政論家布朗氏（Constantine Brown）就拿兩件事作美國目前的隱憂，第一是意國共產黨若能帶着百分之四十選票的雄厚力量，來參加政府，則意國附入蘇俄集團的日子，恐不在遠了，第二是「蘇俄下一步的圖謀顯然是要在夏季以前，把奧國完全放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瑞典、挪威、丹麥、這三個北歐國家，不久也總會隨着芬蘭之後，迫而與蘇俄訂立互助或同盟的協定

彈着同樣調子的阿爾索甫氏兄弟（Joseph and Stewart Alsop）在他們的政論專欄裏，也說：「一向許多人主張用友誼的態度和蘇俄談判，去解決歐洲問題，但東歐局面最近的變動一再證明了這類主張簡直全無意識，因爲蘇俄現在已施用暴力，去達到它對東歐的要求。至此，歐洲局面已到了再也沒有談判的餘地。美國現下祇有靜候這齣武劇的下一幕。」

在這一流的政論家的眼裏，目下世界的危機不在乎美國自身的擴張慾望，而在乎蘇俄刻下着着運用共產黨的力量，去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權。他們所怕的，是希臘和意大利一入共產黨的掌中，則蘇俄力量就直接控制了地中海，能將美英勢力排諸南歐和近東以外。地中海的運輸線和近東的煤油，就與英美絕緣。東歐南歐既入蘇俄集團，法國馬上要成了孤島。法國雖有西歐五國反共聯盟的關係，可以抵抗一時，然而法國最後如果跟着歐洲的趨勢，爲內部政治經濟局面所迫而加入共產黨政權的營壘，則佔駐德國的美軍，就陷入四面受敵的困境，勢不能不撤退，而英國的地位從此也難望久持了。在亞洲方面，中國共產黨勢力的龐大，印度和各殖民地人民對蘇俄的友誼態度，造成了蘇俄在亞洲的外圍勢力。局面發展到這地步，蘇俄就能雄據中央，撫翼歐亞，在軍事上蘇俄地位的強固，足以使美國勢力不能在歐亞二洲佔有穩定而可守的據點。

這就是上述一流政論家正在告訴美國人的一個惡夢，這也是美國當局強硬對俄政策的表面動機。馬歇爾計劃之急急期於四月一號以前在國會通過，也是針對這惡夢而發。拿着這種想像和假定做背景的美國對俄政策，盡頭處若是和平的美境，那眞是歷史的奇蹟。

（二）「直達戰場的道路」

再在左邊的言論看，他們儘管攻擊馬歇爾計劃，和批評美政府不肯以主動地位，去取得蘇俄的諒解，但他們心裏是一樣地起了戰禍勢難避免的恐怖。例如華萊士對國會的聲明和對人民的演講，都說捷克政變是馬歇爾計劃迫出來的蘇俄自衞行動。他說：美政府今天是對俄「強硬」，明天跟着是對俄「更強硬」，後天那就難免短兵相接了。華氏雖在竭力鼓吹對俄諒解，圖挽狂瀾，但他自己也知道現在大局的趨向，正和他的主張背道而馳。

素持溫和論調對俄的華爾堡氏（James P. Warburg），前幾天爲文分析東歐政變所引起的危機，他說：「爲了要火速阻止蘇俄勢力的伸張，美國無形中以世界警察自任，想用美國的地位和力量，去鎭壓世界秩序與和平。蘇俄雖然也是拿着同樣的主意，但雙方以同一的態度相臨，使局面加倍的危險。蘇俄的基本圖謀，是想攔截美國的伸張道路。同時，蘇俄之不明白美國的動機，一如美國對於蘇俄動機之缺乏了解。二者之間捫心自問，是沒有那一方面是眞想流血戰爭，但是雙方都怕戰爭終不可免，所以雙方都準備應付和平萬一失敗以後的局面，提快先擊奪人，競相擴大前方的勢力範圍，爭取遼遠的軍事據點。這一舉一動都使對方覺得自己心裏的恐懼確有所本，因而積極地採取同樣行動，以資對抗。這就是直達戰場的道路，至於那一方面首先發難，是無關重要的問題。」像華爾堡一類的立場，雖然未說戰爭迫在眉睫，但也同樣的覺得世界的和平日子，一天天的短促。因爲東歐的政變和美國國會上議院之立刻隨之通過馬歇爾計劃，正是走着華氏所謂「直達戰場的道路。」

這樣的輿論空氣，無論是左是右，都幫同現局去造成美國人民對世界和平的悲觀態度。這兩年內，美國人對和平抱悲觀的，不斷在增長。格洛普博士的民意測驗（Gallup Poll），不獨證明了這一點，而且表出美國人

多數指定了蘇俄爲下次戰爭的禍首。下面第一項測驗的問題是：『你以爲十年內美國是否又要從事戰爭？』

答案	有戰爭	無戰爭	無意見
一九四六年三月	百分之四九	百分之三八	百分之一三
一九四七年四月	五〇	三八	一二
一九四八年三月	五四	三六	一四

第二項測驗的題目是：『如果戰爭難免，你認爲那一個國家將是啓釁的罪魁？』答案中，蘇俄佔百分之七十，美國百分之二，英國百分之二，資本家和政客等百分之六，其他百分之七，無意見者百分之三。（以上數字加起來超過一百，因爲有些人同時寫下兩三個答案。」

抱着這種態度的美國人，今年大選時，斷不會選出對蘇俄求和平的政府。除非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能有推翻歷史慣例的旋乾轉坤力量，下屆政府還照樣的是民主共和黨的世界，而這兩黨中無論那一黨握權，對俄政策一樣的祇有繼續強硬，不會曲求和解。

但這兩黨的外交政策，也許還有些微的程度上的差異。這就是共和黨的對俄立場比較強硬和急進，該黨領袖之主張軍事援華最力，是一個證明。現在杜魯門領導下的民主黨政權在下屆繼續獲選的希望，一天天的減削。華萊士第三黨運動勢力之強大，遠超民主黨人士意料之外。而且，杜魯門以提高黑人地位爲口號，去吸引美國北部各州的黑人選擧票，民主黨歷來倚作支柱的南部各州，於是大嘩起來，指杜氏不惜犧牲南方利益，拿黑人問題作玩弄政治的工具。南方各州州長現已聯合反對杜魯門做民主黨下屆總統候選人。據格洛普的民意測驗，今年正月南部各州的選民擁護杜氏的，還有百分之七十三，但三月初旬已減至百分之六十。華萊士和南部各州，是民主黨的左右兩翼，現這兩翼都起來折台，那眞是去首去尾，身其餘幾。假如民主黨內部的分裂造成了共和黨的勝利，則明年美國外交政策之改弦更張，催促戰禍的來臨，是一件很可能的事。

換個看法，假如選擧結果，民主黨保持政權，美國外交政策不取急激的軍事途徑，而繼續走馬歇爾路線，其效果最多不過是把火藥線伸長，延遲爆炸罷了。現在的馬歇爾計劃，甚至在公開的名義上，已經不是當初所說的『以金錢去買和平，』而是以金元，物資和軍械，沿着歐亞二洲的蘇俄國境邊沿，築起一道美國防俄的外圍線，和蘇俄現下正在趕築的國境外圍堡壘，互相對峙。這裏，歷史上無數的國際悲劇的教訓，很清楚地擺在我們目前：國際兩大營壘對峙的結局，是一決雌雄。從美俄雙方的觀點看來，趨勢都是凶多吉少。

從蘇俄觀點看，馬歇爾計劃的影響一在歐洲生了根，美國勢力就一步步的直迫蘇俄國土，作起戰來，蘇俄會失了前衛的緩衝地帶。一如華萊士所說，這種恐懼心理，驅使蘇俄趕於馬氏計劃沒有全部推行以前，利用共黨政權去控制了捷克等國，藉以建立前衛的崗位。再從美國的觀點看，蘇俄這種擧動是積極伸張勢力範圍，若讓它一步步的推進，不去攔截，結局必然是席捲東亞，囊括西歐，兩洲版圖，盡操蘇俄掌握，所以美國不能不趕速應付——趕速到急不暇擇，凡是抗俄的勢力，無論是淸明的還是腐敗的勢力，一律給予支持援助。正如美國許多自由派所說，不惜把美國集團的外圍，變成藏汚納垢之所，以求火速完成歐亞二洲的防俄地帶。三月十日捷克外長Jan Masaryk自殺後，馬歇爾跟着就說，捷克事變已把歐洲局勢弄得非常嚴重，三月十五日他又對國會力陳歐洲局面的萬分緊急。馬氏這些言論的目的，雖然是想把國會議員們痛快的驚嚇一下，叫他們從速撥給馬氏計劃的款項，但他的論調也並非言不由衷。現在雙方行動的方向，已不是和平基礎的探求，而是戰爭準備的競賽。

(三)大戰前夜氣氛的對照

今日的國際危機已煎迫到什麼程度，我們暫且不必加以勉強的診斷，但國際現局和美國政策所襯托出來的美國政論與民意，似乎又是暴風雨前夕的氣氛，目下美國空氣的緊張和對戰爭的肯定態度，比起珍珠港事前，有過之無不及。

那時我已經來了美國，還記得歐洲戰事未發前兩年，略有見識的歐亞人士都確知中日的烽火和德國的圖謀，勢必蔓延全球，但那時的美國輿論還是十分散漫超脫，多半美國人幾乎認爲歐亞的災厄不過是另一星球的紛爭，不會也不應直接把美國拖進去。就是到了希特勒把歐洲翻成血海，歐戰已打得火熱的頭兩年，美國還是在多疑寡斷的歧路上彷徨，國會裏和輿論界的孤立派還支配着很大的政治勢力，叫很多的美國人還覺得這次美國應該能夠置身局外。無論是在朝在野的有力領袖，都很少敢打着鮮明的旗幟，出來主張美國大規模的澈底準備戰爭。那時倘若有人用肯定的語氣，明白地預言美國必定很快的被牽入世界大戰漩渦，大衆未免都看他是在盲目的賭彩，甚至看他是個推廣戰禍的危險人物。一直到了珍珠港事發，才像暴雷一樣的把美國人驚醒，把美國一手推入戰神的掌握中，美國這才消極地接受了厄運的挑戰。

美國這種半推半就的戰前姿態，比起現在美國對戰爭準備的亟亟不可終日，確有很大的差別。在今日大部分的美國人眼裏，共產主義的恐怖，和共黨勢力的伸張對於美國利益和立場的威脅，並不弱於法西斯主義。美國人儘管說俄國人的心理是懷疑猜忌，專橫自用，不能合作，儘管說是共產主義的最終鵠的是要統治全球，但美國人自問也不見得能夠推誠的信任對方，不見得自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能夠長期的相安和共存。美國人今日之覺得對俄積不相容，勢難妥協，幾乎甚於戰前之對軸心。這種不相容，難妥協的立場，是造成美國人對戰事可能性的肯定態度的重要因素。

這態度如果祇是集體心理的一時衝動奮激，我們還可以望它像颶風一樣的吹了過去，然而它不是暫時的波瀾，而是代表大戰結束後兩年多的明顯趨勢。從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春夏間，美國輿論空氣對於決定世界政局的美俄和平問題，還是充滿了期許和希望，那時候，簇新的聯合國組織似是地平線上剛冒出來的晨曦；在亞洲，中國的國共談判似乎還有些微希望；在歐洲，和約及東歐國家政權等難題，還是含蓄未發，大家雖然知道問題的前途有漫天的荆棘，但都還在希望日後的談判和聯合國組織的新力量，可以把它和平解決。但一年以後的一九四七春夏之交，局面兩樣了；在亞洲方面，中國國共的決裂和流血，是旣倒的狂瀾。在歐洲方面，東歐國家的共黨政權向美國在歐洲勢力展開鬥爭，歐洲和約談判的僵持，促成了美俄兩大集團的對立；聯合國組織到處觸礁，美國人心目中的理由，是俄國人成天在那裏拆台，是『俄國人皮氣喜歡濫用否決權，不和別人妥協，』是『不能和俄國人打交道。』當初對於和平的期望，於是一變而爲嚴重的懷疑。從那時到現在，不到一年，這對和平的懷疑業已一變而爲未來戰爭的肯定了。美俄和解的希望從此更渺茫，而今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再也不能從和平意向的方面去找尋了。

這幾天是冬季學期的大考，今天早上有一位唸社會制度科的學生，穿起軍服來見我，請求提前大考。他說，他是空軍的後備現役軍人，他今天晚上就要參加結隊長途飛行的演習，飛到南方去；他說，他上次在南太平洋戰場幾次險些兒送了命，原因是缺少事前的充分訓練；他說，現在剩下的時間是不多了，他想要好好的訓練一下。我聽了，想不起回答的話，祇能悵惘地對他默視點頭，抽出紙來，開了幾道題目，給他考過之後，祝禱他安全，送他去了。他出去後，我起了一陣幻覺，似乎無數的抱着像他一樣的心境的美國青年學生，在我眼前呈現出來。

論神祕思想——神祕的邏輯

張述祖

這裏所謂神祕思想，即指認爲某種事物對他種事物發生影響，而其所以能發生影響的關係，則非人類現有的事物知識及邏輯方法所能說明。比如算命或看手相，就是認爲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時辰或掌心紋路，可以影響他的一生吉凶禍福。出門遇見棺材，可以使人發財。早晨有喜鵲在屋脊上叫，可以使人有喜事。大年初一罵某人殺頭鬼，這被罵的人，本年內會遇凶事。小兒夜哭，貼個紅紙條在十字路口，上寫天皇皇地皇皇云云，讓過路的人去唸，就可使小兒止哭。拿紙剪個人形，或用木刻個人形，上寫某人的名字及生辰年月，拿一枚針釘在這個紙人或木人心口，那被寫名字的某人就會病倒，甚而至於殞命。漢武帝手中的巫蠱之禍，就是這類把戲，而冤枉殺了多少人，連兒子都逼死了。諸如上述的例子，眞是不勝枚舉。不只中國人如此，任何民族都有這樣無數的這些深入人心的傳說。歐洲人普遍地認爲「十三」這個數目，標在任何事物上，都會發生不好的影響。一根火柴要點着第三枝香烟，便可有不利的結果。祈雨的儀式中，往往有噴水或洒水的舉動，這便是認爲人噴水或洒水，可以使天雨。不管這種神祕的影響是否存在，而人們總是多少認爲牠存在的。這種「認爲」就是我們所說的神祕思想。

現在我們就是要來看，人們究竟根據什麼，來認爲這種影響存在呢？人們怎麼會把不相干的事物，看成相干的呢？這其間一定有些線索；不過是些耐人找尋的線索。筆者願意把自己隱約望見點影子的線索，說出來請大家評斷，看是否眞摸着點影子。筆者認爲這其間的一條線索，便是緣名求實的原始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中世紀的實在論（Medieval realism）中，得到系統的表現。而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則雖並未成何系統，但直至今日，依然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用這條線索，可以把實際上毫不相干的事物連繫起來。

「名」本來是代表「實」的，因其在個人及種族經驗中，曾無數次地與「實」在一起，經心理學上的交替歷程（Conditioning），就具有了「實」的作用。例如酸梅的「名」，可以具有了酸梅的「實」的作用，而使人看見或聽見「酸梅」二字，就流口涎。肚子餓的人，看見或聽見「紅燒肉」三字，也要流口涎。人類爲了交換思想，以利共同生活起見，給每一物立一「名」。這「名」可以是語言，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圖畫或其他符號。而每一「名」均因多次與「實」相聯，都多少具有了「實」的作用。人類不止給物立了「名」，並且進而給物的屬性、物的作用、以及物與物的關係，也各立其「名」。爲了用起來方便，並且使後邊這些「名」，也可變成了物名的形式。達到這個地步，於是原來是由人造作出來的東西，就日漸有尾大不掉之勢，反轉來竟然要役使人了。不用說本來是代表物的「名」，對人類取得了客觀存在的地位；就是那些代表依附於物的屬性、作用、關係等的「名」，也對人類取得了客觀存在的地位。人類對詛咒與祝賀的認眞，便是明證。咒一個人遭瘟，被咒的人，多少有點認眞以爲你把瘟放在他身上了。祝一個人福壽，被祝的人，多少有點認眞以爲你把好的時光送給他了。

不管是用話說出的，用字寫出的，或是用圖畫等符號表示的「名」，對人類都多少具有其所代表的「實」的作用。原始野蠻人固然如此，現代文明人亦然；請想想今日的世界所流行的口號、標語、宣誓、申斥、褒獎、慰問、恫嚇等等，何曾見個「實」來？還不都是些「名」？在原始社會中，無論說話，寫字或畫圖，都有許多禁忌。就是說有許多「名」，不許人輕易動用。即至今日，這類禁忌，也還是有的。比如關於重病人，不能說「死」字。好像一說出「死」的「名」，「死」那樣「東西」，就會沾染着病人似的。我國古代，對於「名」的使用，尤其謹慎；甚至寧可予人以「實」，而不予人以「名」。國語周語中載『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請隧焉，王不許。曰：……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這顯然可以看出周襄王寧願把實實在在的土地，割送給晉文公，而不肯給他「准予隧」的一句話或幾個字。更有趣的是周襄王坦白地對晉文公講：你要挖隧道通往墓地，隨你去挖，但我不能予你名義上的允許。那就是說你可以有隧的「實」而不能有隧的「名」。孔子對於「名」的重視，那是更不消說的。他講『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也就是因爲人們對名是很認眞的；你要隨便給某件事物加個不相當的名，人們就要照着牠的「名」去應付或使用牠，那不要搞得混淆不清了麼？

大概在人類最初可以運用語言的時候，因爲運用起來的困難，恐怕非眞正必要，不肯運用。因此對於語言的力量，一定覺得十分強大。因爲聽見說虎，往往眞有個虎；聽見說殺，往往眞有人頭落地。大抵統制階級，一定是具有較高的運用語言能力的人，而他們不說話則已，一說必有大事。他發一聲命令說賞羊一頭，眞的就有一隻羊到手。他發一聲命令說打屁股，屁股馬上會痛。並且爲了防止命令的濫發與盜用，消息的訛傳，對於多言是懸爲禁規的。試看所謂『敏於事而愼於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一言可以喪邦。』『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云云，都是教人不要隨便說話的。所以在原始社會中，沒有權力的人，是既不能予人以「實」的人，也是不大說話的人。有權力的人是能予人以「實」的人，又是說話的人。「名」與「實」的連結，一起頭就是這樣地密切，又經過了無數代的相沿，難怪「名」會具有若大的魔力了。

由文字的發明，聽覺的「名」，變成了視覺的「名」。聽覺的「名」較視覺的「名」爲虛；因爲說了就完，再想聽沒有了，遠處也聽不到。至於視覺的「名」，則雖然也是「名」，但本身即比較實了些；可以留在那裏俟諸異日，也可以傳之遠方。當然最初運用文字，更較運用語言爲困難，那恐怕尤其是少數統制階級所特有的本事。並且運用起來既然困難，所以就是會運用的人，也輕易不肯運用。絕沒有像現在拿來做打油詩之說。於是非至和戰賞罰等大典，不輕予運用。所以「名」不寫出來則已，寫出來一定跟着有了不起的大「實」。因之不論在原始社會或現代，字的魔力，要比話的魔力大些。口頭約定不算，必須見諸書面，才靠得住。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那便是西人的簽名和中國人的蓋章。只是自己的名字擺在那裏，就和自己站在那裏一樣。一張死刑的口供，也只消把個名字簽上，甚至在別人寫好的自己的名字底下，畫個十字就行了。因爲這是由原始社會一直演襲下來的，賦予字的魔力。在原始社會中，只要是誰的名字和「死」字寫在一起，那是非死不可的。因爲那是有生殺予奪大權的首長，才能寫的。他寫了就照辦，決不開玩笑。一直演襲到今日的人類

，對於符咒的信任，其原委亦同。因爲在原始社會中，政治、軍事、宗教的首長是一個人。大體而言，政治對內，軍事對外，宗教對自然。在政治及軍事兩方面，旣然首長所說出或寫出的命令，必見諸「實」，於是首長所說的話及所寫的字，已由此具有了「實」的作用。那麼他再把這種具有了「實」的作用的話及字，施諸自然，人們也當然會多少信任牠們的作用了。首長在兵臨他族城下時，寫個「降」字，居然成千的人馬眞個降了。首長對某人說個「死」字，某人馬上眞的死了。那麼首長唸咒要天下雨，或畫符要毒蛇遠避，人們怎能不信任呢？筆者認爲這可以解釋語言文字的「名」，爲什麼具有了眞物眞事的「實」的作用。旣然原始的「名」與「實」，是依這樣密切的關係，而有化爲一體之勢，也就是說，旣然人類在原始時代，卽由「名」與「實」的交替，對「名」建立起本來是對「實」的反應，於是這種原始的傳統，演變下來，使人類對後起的孳乳日繁的語言、文字、圖畫等符號的「名」，也要緣之而求「實」。認爲每一個字詞或其他符號的「名」，必指一客觀存在的「實」。把作用、屬性、關係，也當作了客觀存在的「實」。簡單說一句，就是把「事」也「物」化了。

圈子兜遠了點。現在我們可以轉回來說明緣名求實的原始思想傾向，爲什麼可以解釋我們所說的神祕思想了。緣名求實的思想傾向，旣然把「名」認眞爲「實」，把「事」化成了「物」，而客觀存在的實物，除具有可以影響其他東西的作用外，並且有在空間中傳遞的可能。一塊大石頭可以壓死人，這是他的作用；也可以由山上撥來院子裏，這是牠在空間中的傳遞。一本書可以予人以知識，這是牠的作用，也可以由姓張的傳遞給姓李的。別的東西，可以拿其作用來影響我。離我遠的東西可以由傳遞而到我身邊。客觀存在的實物，還可以與他物分合，所以原來不是我的東西，可以屬了我。玉掌圖謂『玉柱紋從掌直去，爲人聰智必聰明。學堂更得文光顯；一定中年作相公。』這是說掌心有一條縱行通紋，可以使人一生事業亨通。「通」本來是代表屬性、作用或關係的字；因爲人類演襲下來一種思想傾向，認爲每一「名」必指一「實」而「實」就是物，就是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所以「通」就由此轉變爲一種「實」，或一種東西，於是由一個人的手上，可以傳遞到他的事業上。同樣的道理，事業這個「名」，也可以化爲實，化爲客觀獨立存在的物。兩個實物可以結合到一處，「通」旣然可以和手結合，當然也可以和事業結合。許負相手篇謂『手有橫理紋，殺害不須論。』這是說手有橫紋兆橫死。也是把「橫」這個字實化，於是由手上可以傳遞到生命上；當然，生命也是被實化了的。神相全編謂額部有「王」字紋者主封侯。這也是認爲「王」這個字在一個人身上，這人就會成王侯，把「王」字當作實在的王侯祿位。講堪輿之學的管氏地理指蒙謂塚墓所在的地勢『聚者成，散者敗，延者長，促者短。』也是很清楚地把指地勢的聚、散、延、促等屬性的名，化成了實，於是就可以由塚墓所在的地勢上，傳遞到塚主家庭的事業財產上。扁鵲子午經有云：『木命人行年在木不宜針。金命人行年在金不宜灸。』按星命之學，一個人的命是由他的生年規定的。而年次之以五行代表，只是一種符號。把符號當作了實物，於是就認爲金年眞有金，木年眞有木。他的生年如屬木，那麼這個生年，就可以把木傳遞給他的命。他的命本來有木，若活到木年，於是再由這個年，給他傳遞點木，於是他的命裏，木就更多了。現在再用針來刺他，因爲金可以剋木，所以就會傷了他那帶木的命。金命人活到金年不可用灸，是因爲灸用火，而火能剋金。流行於民間的若干信念，如前擧認爲喜鵲能帶給人喜事，所以然者，就是因爲牠的名字上有個喜字；喜這個字，因實化而變爲物，於是可以由喜鵲傳遞給人。認爲松柏所以能帶給人壽，就是因爲壽乃松柏的屬性；屬性實化而爲物，所以就可以由松柏傳遞給人。在一幅緞子上繡個大福字送給人，就可以給人添福；也無非認爲「福」字就是實際的福，可以傳遞。以上所擧都是關於傳遞的例子。至如在一塊石頭上，刻「泰山石敢當」幾個字，這塊石頭就變成泰山石，而有鎭邪的作用。寫個「姜太公在此」的紙條，貼在那裏，就認爲姜太公眞在那裏，可以發生使其他小毛神畏避的作用。拿石頭刻對獅子，放在門口，拿黃表寫個「虎」字，貼在門楹上，用以驅邪；都是認爲「獅」「虎」的名字，有實獅實虎的作用。這是關於認爲「名」具有其所代表之「實」的影響作用之例。

如果神祕思想的線索，就是如此簡單，卽由於化名爲實後的影響及傳遞作用，那倒也不算十分神祕了。無奈實際上的線索，是轉過許多灣的。所以結果弄得並不簡單。大概轉了些什麼灣呢？我們試來分析一下。第一原始語文，數量有限，同音通假的甚多。因此演習下來一種同音通假的思想傾向；把同音的「名」，當作同一的「實」。如我國的圖案中，每有用蝙蝠處，據說是因爲蝙蝠帶着福；這就是由於「蝠」「福」同音。棺材帶着財，魚帶着富貴有餘的「餘」；也是因爲「材」與「財」，「魚」與「餘」同音。有的地方姓康的不娶姓朱的，說是怕被吃垮。也是因爲「朱」「猪」，「康」「糠」同音。第二以部分代表全體，再進而把代表當了眞。因爲虎有威嚴，所以虎骨虎皮都可以趨邪。泰山石所以能鎭邪，是因爲牠乃泰山的一部分。第三類似（Similarity）與類比（Analogy）。噴水和下雨有點類似，所以巫師噴水可以喚雨。太陽和一個紅圓盤子有點類似，所以巫師拿一個紅圓盤子可以使天晴。這就是先以類似的事物，作原事物的代表，進而就把代表當了眞。所謂類比卽因爲某方面相同，卽認爲其他方面亦完全相同。春秋公羊傳載『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涕霑袍曰，吾道窮矣。』這只是因爲麟爲獸中所罕見，聖人亦爲人中所罕見；麟與聖人，只是在罕見這一點上相同。而孔子見麟被獲，失掉自由，遂認爲自己這個聖人的事業，也將與麟的活動相同，終歸莫展。這就是先以與原事物某方面相同的事物，代表原事物，進而就把代表當了眞。第四象徵（Symbolization），卽靠着某些方面的類似，來拿具體的事物，代表無法直接表現的抽象概念；再進而把代表當了眞。水龍經有云『蟠龍之水後頭兜，代代作公侯。』這是說塚墓所在地若有一條流水，由左向後繞右，再繞前，再繞左，再繞後，則塚主的後代必綿續昌達。拿空間的後來指時間的後，本來是一種象徵的借用，而在人們的思想中，把兩個「後」，因同用一個字，所以就看成一物。又拿流動的「流」來指流傳的「流」，本來也是一種象徵式的借用，而在人們的思想中，把兩個「流」，因用同一個字，所以也就看成一物。於是墓地週圍的水繞向後方流動，就是塚主的福澤向後代流傳，因爲福澤的澤，也是拿水來象徵福的。前擧事業亨通的「通」，橫死的「橫」，也都同樣是象徵式的借用。第四間接的影響或傳遞。比如時辰和方位所帶的吉凶，可能是由於原來在某時辰或方位所發生的吉事或凶事，把吉或凶傳遞給那個時辰或方位；於是以後凡與該時辰或方位接觸的事物，均可轉受到那種吉或凶的傳遞。以上的分析，只是儘我們一個外行所想到的指出一點，實際上恐怕還有若干更曲折的灣可轉。所以神祕思想的基本線索，雖是化「名」爲「實」後的影響與傳遞，但經過許多的曲折後，遂使這種基本關係曖昧不明，非方士巫師等專家，不復能聯繫起來了。

我們一再的稱這種神祕思想爲原始思想，然而同時我們也提過，這種原始思想的傾向，在現代文明人中，仍然有其相當堅強的勢力。隨便擧些例子來看：比如認爲山清水秀的地方出生的人清秀。山的清，水的秀，如何能傳遞給人呢？這是萬不能用人類現有的事物知識及邏輯方法，

把牠們聯繫起來的。清秀是山水的屬性，又是人的屬性，屬性如何能在空間中傳遞？又如何能與物任意分合？如何能從山水上分出若干來，加在人身上？何況山水的清秀與人的清秀，實際上並非同一清秀，只是字詞的象徵式的借用。除非受了綜名求實的思想傾向的驅使，硬認為每一字詞必指一「實」，且同一的字詞，必指同一的「實」，而「實」就是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因之可在空間中傳遞，可與其他東西任意分合；否則其間的線索，絕難成立。另外如認為站立及行走時身體正直，可以使其人行為正直。因之要人「抬起頭來，挺起胸膛，立定脚根，樹直脊樑」。並且聲明這並不是由體育着眼，而是由訓育着眼。這種神祕思想，我國黨政訓練以及教育機關，簡直奉為圭臬。但試問正直是身體和行為的屬性，且行為的正直與身體的正直，字詞雖相同，然亦係象徵式的借用，實際上此正直固非彼正直。則所謂正直要非硬把牠化作實物，並且認為同一字詞必指同一實物，如何能由身體傳遞給行為呢？再如許多人認為禮堂上寫「禮」「義」「廉」「恥」四個大字，每天和學生接觸，就可以把禮、義、廉、恥這四樣「東西」傳遞給學生。這也無非是因為把字看成實在的東西了。

以上是說現代文明人，依然不顧知識及邏輯地，認為每一「名」必指一「實」，每一「實」均可在空間中傳遞並與其他東西分合。現在我們再舉些例子來說明現代文明人，仍然相信「名」具有其所指之「實」的影響作用：請大人物簽名，和寫姜太公在此是一個味道；認為那個人的名，就有那個人的作用。把愛人的名字鐫在戒指上，就多少認為有愛人隨時貼身的味道。離開祖國多年的人，看見祖國的國旗，就萬感交集。開會時掛起總理遺像，就像有總理在場監視。大學的學生畢業後要拿母校的校名，做個小徽章帶在身上，就多少認為有自己和母校永久在一起的味道。這類例子要舉起來，那眞是罄紙難書。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舉出好多來。

把名當作實的這種思想傾向，在人類生活上，是儘有其相當的功能（Function）的，要不然牠不能夠這樣永延不替。牠可以加強人對人相互影響的力量，人不能運用實事實物來影響別人時，他可以運用代表實事實物的名。牠也可以擴大事物的影響範圍。一事物的影響作用，必受時間，空間，等的限制，借神祕思想，可以突破這種限制。尤其是當人處於無可奈何的光景中時，可以使人本來無所恃，而認為有所恃，於是增加自信力，而少受無謂的恐懼，悲哀，憤恨，焦慮等情緒的擾亂。因為人類的知識技能，雖然到今天，還是不能解決生活中的一切問題。所以到萬分無辦法的時候，必然會訴諸神祕思想。因之假如我們眞是遇到超過人類知識技能的最高限度的困難，而委實萬分無辦法時，才用神祕思想，那倒是未可厚非的。但不好的是因為有了神祕思想，作了人類的最後靠山，所以大多數的人們，都是在有辦法可找，而懶於去找的，並非眞正無可奈何的時候，就用神祕思想來應付問題。甚而至於有好多人明知有新的知識技能可供利用，而偏不去用，寧願用那最偷懶的神祕思想。如我們前邊所舉的認為身體正直即可使行為正直的例子。其實現在科學的教育方法中，已有不少切實的改善行為的方法，此那種立定脚根云云的方法，切實得多，可是偏要訴諸神祕思想。明明知道有較好的訓育方法，可以使人明禮義知廉恥。而偏用神祕的寫大字的方法。這些與明知有特效藥可以治病，而偏用符咒有何不同呢？所以這種思想傾向，在這一點上，實在是人類知識技能發展的大阻礙。

（上接十七頁）

通券貶值，比永吉撤退，四平轉移，還要使我們痛心！這是表示中央在經濟上放棄我們，我們一定要電請請願團繼續力爭，跳黃浦江在所不惜！」身為東大訓導長的參議員趙石溪激動地說：「財政部公佈的新辦法，眞是太豈有此理，我不知請願團事前是否有藍本有範圍，這種成果，我們要堅決反對，請願團要負全部責任。」聯席會應有堅決的表示。再者，巨額流通券本票發行，將來更不得了了。」田蘊藻立時站起來喊道：「無論如何，流通券不應再發行了。匯兌及兌換限制應予解除，並維持「一比一一·五」的比率。不應再予貶值，以維繫收復區的人心。」王運乾氏說：「流通券早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他是東北人民的致命傷」。這樣激烈的辯論，繼續了兩個多鐘頭，每人一肚子委曲，都求着恣意地發洩，換言之，就是對政府對流通券的措施，展開了全面總攻擊。但是藉黨發家吃了一輩子黨飯的參議員張鴻學，始終持與衆相反的意見。他恬不知恥地說：「一與十的比率，是經政府多少專家研究決定的，政府的法令既然公佈了，決不能隨便更改，造成紊亂現象。」衆人都嗤之以鼻，最後又說：「在戡亂期間，我們應遵守政府已頒佈的法令，我們民意機構，更不應與政府站在對立的地位，使政府增加困難。」聽他的意思，民意機構，似乎是應和老百姓站在對立地位，而袒護政府的了。然而他終於在衆目睽睽的眼光下，低下了頭。羣情激憤，衆怒難犯；流通券貶值的災難，已如洪水的氾濫難以遏止；請願如救災，因此會議的結果，決定致電蔣主席張院長六項建議：（一）流通券應與關金同樣行使，自由流通全國；（二）停發流通券，並限期收兌；（三）流通券與法幣之比值，仍應改為原定之一比十三；（四）打開流通券內匯限額，不收匯水；（五）限制當地中央銀行，發行巨額本票；（六）法幣出關前，公營事業仍按一比一一·五計算

流通券貶值所掀起的波濤，似乎暫時掩過了無止息的戰火。物價狂漲如利刃刺心，使瀋陽人心惶惶，薪水階級莫不叫苦連天，對「能否活命」發生了莫大疑問。主持東北軍政大計的衛立煌將軍，陷入了萬般難題的泥淖，無以自拔。他該是政府在東北最後的一張王牌，上任兩月來，一連丟失了五個大據點，使衛氏失去了滿臉光彩；面臨的困難，給政府「確保東北，有決心，有辦法。」的無邊吹噓，一串無情的嘴吧。然而衛氏啞吧吃黃連，仍需打腫臉裝胖子，從沒辦法中找生路。給政府丟盡了的面子，壯壯聲色。所以衛氏調兵遣將之餘，對流通券激起的浪潮，不能視若無覩。因之他於廿日召集羅卓英、高惜冰、王鐵漢、董文琦等商討糧食對策；然而結果也不過恢復議價辦法（這辦法是在共軍六次攻勢時推行失敗了的），赴市外搶購食糧的一紙「頭痛醫頭」的藥方而已。這種屢試屢敗的單方，能挽狂瀾於既倒嗎？恐怕希望很小。

時屆陽春，物價的春潮澎湃無已。東北的局面，由面而線，由線而點，小點逐一被吃掉，長、瀋、錦僅有的三個孤另另的大點，隨着冰雪的消融，似乎搖搖欲墜。作為東北心臟的瀋陽，已像天暖腐爛的白菜，漸漸從心中潰爛了。政府不是一再口口聲聲地宣稱「確保東北，政府有決心，有辦法」嗎？現在已應拿出辦法來，不是只說硬話的時候了。

（三月廿一日寄）

土地改革·地道戰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現在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換型期，秦始皇雖然摧毀了周朝以來的典型封建制度，完成中國統一；但是沒有新興的工商業，生產關係沒有新的變更，半封建的社會，一直在更朝換代中保存到現在。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僅僅是部分的盡到了現代民主革命的使命，然而頑強的封建勢力，以城市為媒介勾結外力，而仍然根深蒂固的施展他的勢力在農村。農村的剝削的生產關係，還是沒有變革。中國的那些落伍的地主們，他們既不能像德國地主自己去做新式的大規模的經營，更不能像英國地主把整批土地租給農業資本家去經營管理，他們是雞零狗碎的把大塊的土地割開，分租給他們世代奴役的貧苦農民，因此農村生產不能有半點的進步，而剝削程度隨着社會不安與地主階級享受慾的加強而日益加深。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有的人估計農村土地分配的情形如下：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土地，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却總共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這種估計是否正確，有待於正確的統計的證明。但是農村生產的停滯，其主要原因，當在於土地分配的不合理，與地主階級的封建性。如何使耕者有其田，再進而為較新技術的集體生產，確是中國農村應當解決的問題。有人主張農村須先求安定，但不安定的原因何在呢？那並不是共產黨的「搗亂」，他的在農村中的「搗亂」是建築在過去農村的落伍與不合理上。主張戡亂者，如果只注意枝節與現象，而不注意「亂源」，亂是戡不下去的。

現在解放區中的土地，在軍事與生活變重目的下，地上與地下都變革了。這個劇烈的變革，使得具有舊意識的人非常震驚。解放區深厚的軍事力量，是從這種變革產生出來的。兵源根源沒有問題，在他的新社會秩序下，可以施行「空心戰術」，後方不要任何警備兵力，試問政府區，能在任何地方不用兵力警備嗎？全國二千多個縣市局中，在共軍手中約為四百九十個左右，相當於四分之一，其佔領面積約為二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億三千萬至六千萬。

地上的土地變革，就是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地下的土地變革，就是中共的掘土戰術，也就是地道戰。這兩種變革，使得地上地下都變了形。要研究目前解放區的本質，與土地的變革是分不開的。

中共土地政策的演變，到現在已經很有了幾次，在中共初期並沒有具體的土地政策，一九二七才以革命委會的名義發佈四大政綱：（一）實行土地革命，（二）建立鄉村政權，（三）沒收五十畝以上地主的土地，（四）擁護農民利益。一九三〇年五月又由革命軍事委員會頒佈「土地法三十一條，沒收一切私人和團體的土地，以「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辦法，平均分配給無地或少地農民。到九月間，中共在上海舉行中華蘇維埃區代表大會，通過「暫行土地法十六條」，規定土地之一切買賣、抵押、與佃租均被禁止。並主張組織集體農莊與國有農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在瑞金召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土地法十四條」，做為土地革命的準則，以消滅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關係。一九三三年江西突圍西征，到了陝甘寧邊區，改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以為邊區土地問題的重心不在分配而在利用，同時為了準備抗日，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形成，放棄了土地革命政策，製定了「陝甘寧邊區地權條例」、「土地登記條例」、「土地租佃條例」及「農業統一累進稅試行條例」等法規，他的重要內容，還是維持私有制度，保障減租減息與繳租繳息、獎勵墾殖、負担稅賦。這是抗戰期間的做法。同時間內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過中共中央對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之決定，制定「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十二條」，加重說明抗日統一戰線之土地政策與內戰時期土地政策有其根本區別。此種溫和的土地改革，在抗戰八年中鞏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及陝甘寧邊區。

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軍事調處期間，中共曾擬在陝甘寧邊區試行以土地債券收購土地，繼續他的溫和政策，後來全面決裂了，國軍攻下延安，這種辦法也未得好好的實施。在陝甘寧邊區以外的解放區，對於土地問題處理的辦法多是因地而異，在山東有「土地改革暫行辦法條例」，在晉察冀就有「勸獻」與「沒收」，「倒租」與「倒息」等方式，使地主退出土地，分給貧農。那些不同的方法可以看做中共對解決土地問題的新嘗試。一九四七年雙十節中共中央公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十六條」，這是現階段中共對土地問題的重要決定。這個土地法大綱大部分是土地分配辦法，他的要點如下：

（一）沒收地主之土地，廢除一切廟宇、祠堂、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之土地所有權，日偽的一切公地和漢好的土地，當然更在沒收之例。至富農中農及貧農的土地，因為參加土地分配時，係將鄉村所有之土地重新分配，實際上也等於沒收重新分配。

（二）土地分配之原則，係將鄉村中一切土地，按鄉村中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在土地質量上抽肥補瘦。

（三）執行土地分配之合法機關有三：（1）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之委員會。（2）鄉村中無地少地之貧民團大會及其選出之委員會。（3）區縣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之委員會。

（四）實行土地分配時以鄉或等於鄉之行政村為單位，但區或縣農會得在各單位間作必要之調劑。在地廣人稀地區，得以鄉以下較小單位分配土地。

（五）凡私人不易經營之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礦山、大牧場、大荒地及大池沼均劃為公有土地，不予分配。

（六）土地已平均分配之地區，人民如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土地分配後舊契銷毀，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即取得土地所有權。

解放區由這個土地法大綱的實施，不但人與人的關係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也變了，這個地上的變革是空前的，他含有最強烈的階級性，使得貧雇農翻了身，成為他們的主力，更效死於他們的政權的拱衛，當然也因此會淘汰了他們認為階級與出身有問題的份子。但這並不是他們所願及的，他們在進行土地改革運動中也還進行着三查的整風運動，三查的結果，會使得他們認為「不純」的純起來。有人認為三查會使得中共內部分化，這個判斷是錯誤的。或許分化出來的正是他們所願意揚棄的。鄉村是中共的基地，他們要確實的把握住農村，土地改革運動，會使得他們在土地上生根成長乃至壯大。

地上的變革，是以政治的力量達成經濟上的目的，又從而發生了政治的乃至軍事的力量。地下的變革是暫時的純軍事的。在地形複雜的山地裏，共軍和以前

的紅軍用不到多少地下做工，就可以發揮他的游擊戰術。但是在平原地區，却必須依靠掘土做工，變更地形，來以劣勢裝備與優勢裝備周旋。抗戰初期很多人認打游擊建立抗日根據必須在山區，平原上是沒有辦法的。但是八路軍進入晉、冀、魯、豫等省的平原上，用掘土戰術，變換地形，修正了以上的觀念。游擊戰的主要基礎在活的人民，而不在死的地形。冀中冀南都曾先後建立了抗日政權。溝壕地道像蛛網似的密佈在地下，村與村相連，戶與戶相通。這普遍的地下作業，不但改變了地上的地形，在地下也創造了新的有利地形。敵人來了，他們從地下走了。敵人走了，他們從地下來了。而且可以利用地道存儲物資，狙擊敵人。他們積累了八年的地道戰的經驗，現在又應用到內戰上。裝備比較優良的國軍，也正是處於當時日軍的地位，可是戰鬥力並不如日軍，而共軍的裝備與兵額却比抗戰時期大了一百倍的樣子，這就是內戰不能速戰速決的原因。

土地改革增加了兵源糧源，與淸算地主而得來的財富，做爲他們進攻的力量，地道戰術，又增加了平原上農村中的防禦力量。在防禦上除了地道而外還有地雷，共軍製造地雷的小工廠很多，但是效力並不怎樣的大，可是他給予國軍前進時的精神威脅很大，爲了沿途搜雷，就必然使得行軍遲緩，而捕捉不住共軍主力。在膠東萊陽作戰時，國軍沒有更多的測雷器械與工兵，只有驅逐着牛羊猪狗前進試探，等這些家畜用完了，又得用步兵拿着大竹桿遍地觸刺前進。同時共軍對地雷的埋沒也用盡了苦心，有的地方是地雷羣，有的埋土坑下或廁所裏或水井邊，凡是國軍可能去的地方都可能有，也有的將地雷或手榴彈繫在虛掩着的屋門上，當您走進去推門時，地雷或手榴彈爆炸了。更有的在一個地方重埋上兩個或三個，當您用工起掘第一個時，第二個在下邊爆炸了。在晉北大同外圍有過這樣的事，有個工兵排長帶着三個弟兄去起掘地雷，一個工兵將地雷起出時，牽動了下邊的一個，轟的一聲炸了，四個倒都沒有死，起雷的一個人被火藥燒去眉髮，其餘三個人並沒有受一點傷。

國軍將怎樣對付共軍地上地下的變革的力呢？現在還看不出很具體的辦法。農村土地問題是必須解決的，而政府的力量是建築在城市和地主上，他不要他們嗎？他就沒有了力量，他要他們嗎？他們的自私與貪鄙正是他們的贅瘤，這或許是政府方面有思想的人最爲困惑的問題。不要說土地改革了，就是減租減息也做不到。在山西實施兵農合一的閻錫山的幹部說過，「誰在農村裏先分配了土地，誰就是爸爸，後分配土地的就是兒子。」一至於不主張分配土地，而一味爲了地主的利益的人將是什麼呢？他們倒沒有說。傅作義楚溪春在河北現在也天天說要實施土地改革，但具體的方案還是拿不出來，就是能夠拿出來，內容如何不問，却已經晚一步了。農村土地問題是今天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現在是內戰，再講什麼「國家」「民族」那一套有誰會去聽呢。誰一切爲了人民，誰能與人民站在一邊，將來誰就會勝利。

華北剿總成立，傅作義從察綏來到河北，他的在察綏的「動的綏靖」那一些辦法，已經不甚適用，涞水戰役以後，開始研究反地道戰術。春節以來的冀境掃蕩，就是在試行他的反地道戰術。談到共軍的地道戰術時，傅作義似乎很有自信的說，「那沒有什麼，那個耗子不會鑽洞，能幹的貓還是一樣的可以捉到耗子。」但是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能幹的貓，到現在耗子並未捉淨捉光。貓不過是貓，耗子還是耗子。

「掏土豆」是傅作義部試行反地道戰的一句口號，意即從地道裏捕捉共軍幹部和士兵，春節以後的掃蕩，目的是在掘地道、殺村幹、分公糧。一個月以來，在邊緣地區也算折毀了不少地道，但是並沒有到過共軍的腹地，這些地道在想象中還不是多末大或複雜的地道，共軍的後方一定還有不少的大地道網。

據說大的地道恆蔓蜒數十里，裏邊構造很複雜，如果沒有帶路，走進去也出不來。地道裏雖然有路標，那都是一些暗號，外人看了是不懂的，只有共軍的主要幹部存有地道圖，認識那些暗號，有事的時候，由幹部率領士兵和人民走進去，平常是不准人進去的，以免洩露祕密。地道的出入口和氣孔都是在很隱蔽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有的在廁所裏，有的在鍋皂下，也有的在坑洞中。氣孔在水井壁上的最多。在野外的出入口時在坟墓裏，將口用鍋封起來，上面堆上土看去就是一個坟墓。

傅作義部摧毀地道的辦法，主要的是堵塞氣孔，用烟燻洞，將洞裏的人燻暈了，然後分段挖掘。小的地道是可以這樣摧毀的，但是也必須有眼線，知道出入口在那裏，氣孔在那裏，不然茫然無所知，堵無從堵，燻無從燻，挖掘也無從下手。發現不了地道就無從破壞共軍眞正的地下組織，國軍進了村，他們裏糧帶水下了洞，待國軍走了，他們又出來了，有時還會不等您走他就鑽出來襲擊。這地下的變革，地道的普遍，傅作義在試行着反地道戰術，謀使地下復原，將來成果如何，現在還難以臆斷。共軍地上的變革，傅楚的土地改革辦法還沒有出來，他將來是也要他復原呢？還是另來一套抑或將計就計呢？

解放區不僅是農民翻身，變革了人和人的關係，也變革了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更使得土地外形本質內內外外都有了變革，這變革是空前的，歷史上從未有的。

三月十一日

（上接十六頁）

西安的物價只有煤炭比較便宜，現在它的上漲率已經是首屈一指，普通燃煤需一千六七百萬元一噸，商家喊派款受不了，住家戶喊麵粉煤炭漲得受不了，這個年頭，有幾個人受得了！

附帶說一說，一度傳被俘的第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於十六日脫險來西安，據說他兩次被共軍盤查，均答以係炮兵士兵，才能脫身，另外一位王姓軍官作了他的替身。嚴明將軍家屬這幾天正在開弔，遺體已運抵西安，劉戡將軍的遺骸，還沒有下落！（三月二十五日）

（上接十八頁）

方實力而論，不能相稱。開票結果，很多候補候選人票數超過正式候選人，而按規定不能當選，除非立委出缺時遞補。

另一方面，中央與兩黨因有國代糾紛前車之鑒，預先定好一防範之方。即所有國民黨籍提名立委之候選人，先立「辭讓當選書」，繳交中央黨部，然後予以提名。以便將來作勸令退讓友黨之根據。例如首都區域立委。國民黨競選者九人，除婦女劉蘅靜因祇一人，必然當選且無友黨競爭外，其餘八人，均繳存「辭讓當選書」。京市立委額五人，除婦女外，計四人，兩小黨中之民社黨於京市分得一席，其候選人爲朱亦松。故國民黨當選之第四名必須退讓。如不退讓，中央可取辭讓書作根據。因此，開始爆發的立委糾紛有二，一爲得多數票之候補候選人與候選人之爭。屬於黨內互讓。一爲預繳辭讓書者與民靑兩黨之爭，屬於友黨讓選。現在所謂民選立委，已經將得票多者應當選，以及預繳辭讓書應屬無效的法理上根據，研究得很充份，臚列多條，時間一到，便拿出公佈。預料這一場糾紛之激烈，將不亞於國代之爭。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月二十七日）

宜川之役的檢討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陝北戰局轉穩，西安局勢也轉穩，但也只能說是轉穩，誰也不敢說共軍的威脅已消失，事實上共軍正不斷的進攻洛川，對關中地區，也未放鬆。

很多人檢討三月一日的宜川戰役，都認為共軍勝得有點僥倖，國軍的敗，敗得也有些奇突。現在國軍已部份的扭轉劣勢。我們來檢討宜川戰役失利的原因。有一點事實是大家所承認的：就是過份估低了共軍的實力。在西安的指揮部，對敵情判斷太謬誤，而劉戡及其所部，是盡了他們的戰鬥任務的。我們雖然不同意共軍渲染過甚的說法，說他們打了一次類似色當戰役的殲滅戰，可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彭德懷與王震這次的配合是很成功的。當王震於二月二十三日西渡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而將共軍的戰略任務解釋為攻取延安，而從未估計到他們膽敢來「吃」劉戡的這支強勁的兵團。彭德懷留下四個旅的兵力在米脂、綏德，看住榆林，延安的國軍，而分兵一支南下，以拊宜洛國軍之背。這一行動是迅速的，他達成了轉移國軍視綫集中到他身上，而忽視王震的任務。劉戡將軍就曾說過要專找彭德懷幹一下，而看不起王震。這種豪語正中共軍下懷。西安綏署給劉戡的命令是肯定的，不可變更的戰術上的規定，使劉戡沒有考慮或變更之餘地。劉部兵力的過份集中，也是上峯硬性命令的規定。在四子街（又稱丹陽鎮）這一數方里的小村鎮，一共也只有十幾家民房，而高級指揮官軍師長等都拘囿在這小天地中，便利了共軍炮兵的集中射擊。據前方下來的說，這次宜川作戰的共軍炮兵，是攻陷運城，屬於渤海軍區所指揮的精銳隊伍。

宜川戰役的失利，使關中緊、西安驚、人民急、胡宗南將軍則既悲愛將之亡，又有失地之痛，威望更受嚴重的打擊。最高統帥部當然不能不追究責任。三月十一日一度盛傳將主席將來陝，街頭謠懸林立，直到下午三時才撤崗。很多人說主席曾一度來此，事實上那天主席沒有來，而胡將軍不久就親自赴京（一說赴徐州）了。這其中經過我們不得而知，可是西安綏署參謀長盛文奉令撤職查辦的消息已經遍傳了。盛將軍是胡的親信，可是人緣不太好，最近西安曾發現一種若干將官（都是匿名的）控訴盛將軍的印刷品，說他尅扣軍餉，只重派系利益。後來他與各報館打招呼，這一文件未曾刊出。這次宜川戰役失利，他無疑要負直接責任。現在又聽說已經撤消「撤職查辦」的處分，改為記大過一次，以觀後效。宜川之戰後，國軍實力受了很大的折損，所以不得不自其他各地抽調國軍赴援。自三月二十一日起空運部隊開始，接連四天，天天都保持一百次以上的飛行次數，主要的由徐州調來，一部份由四川調來。據說當局以四個師增援陝北及關中，三個師增援漢中及其周圍地區，這是自剿共戰爭以來，胡將軍大規模接受外援的第一次。去秋潼關告緊時，胡將軍尙有絕對的自信，可以不要援軍，就足以制伏共軍的攻勢，現在不得不需要援軍，而援軍的數量差不多超過他所指揮的直屬部隊。當局這種決定，當然是有鑒於西北局面的嚴重與重要，共軍既然再三嚷嚷着要會師漢中，不管他是否是一種宣傳攻勢，也不得不防他一下。這次大量的增援，在消極意義上，可以阻遏共軍攻勢，在積極意義上，還可以改善國軍在陝北的地位。

即使有人將共軍在陝北的攻勢解釋為一種牽制性的行動，可是中外對這次戰役所產生的結果都很注意。南京美軍顧問團，最近派了一位校級軍官來西安，據說是來考察國軍在陝北失利的原因。湯恩伯將軍亦於二十二日來此，一說他是為了訓練新軍的事，來與胡宗南商量，一說是中樞命令湯氏來此調查陝北戰局失利的原因。

胡宗南調職的消息已經傳了很久，這次失利後，反而更沈寂下來。有人說胡將軍因這次的打敗仗更使他不會離開西北了，因為此時此際更易主帥，更足動搖軍心。而且在指揮系統上，胡宗南還有他的歷史地位，現在換一位新人來，除非是胡的舊部如陶峙岳等，否則一定要感到指揮不靈。可是與其仍由胡的人來指揮，不如仍由胡本人來指揮。若換胡以外的人，如朱紹良（一度盛傳朱將出任西北剿匪總司令）等，則指揮上更不靈活。所以，除非戰局好轉，胡宗南暫時不會離開西北了。陝籍軍人中，最為人所注意的是關麟徵，他也是陝西紳耆所矚望的人物，一部份人都希望關麟徵能回到桑梓來服務。甚至有人說，如關麟徵早點回陝西的話，孔從周、趙壽山不致於叛變。據說關麟徵本人亦常常不忘於服務桑梓之念。

胡宗南的作風，已有了轉變，很多人有此感覺。劉戡的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現交由盧宜軒將軍，是很使人驚異的。盧為西北軍老將，久屬孫連仲之麾下，為山東籍，不屬於胡之系統。劉戡的第二十九軍中下級幹部為清一色之七分校出身，也是胡宗南最精銳的部隊。這次交出來，當然有點出人意料。不過這「整編第二十九軍」已經是空頭了，只有靠補撥新部隊來復活。盧宜軒得能承乏此職，恐與此有關。要挽救西北的危局，一定要有新的作風，與大公無私的精神，斤斤於派系利益，只有壞事。胡將軍個人治事治軍認眞，但總不免為小圈圈所拘囿，這小圈圈使胡將軍的地位也受了限制，改弦更張，尙未為晚。

十天前，正是「匪諜囂張」一時，西安市政及治安當局顯得有些過於緊張，對麵粉價格管制放棄了，理由是怕廠商不出粉，他們決定了「只問有無，不問貴賤」的原則，現在麵粉是一百三四十萬一袋。又制定一種新辦法，令市民辦理三戶聯坐具結，就是三戶具連環保，互保這三戶中「無匪黨份子及通匪匿匪情事」，還要由三戶的家長互具切結，然後將這具結貼在門口。市民身份證一律重新換發，並規定一律要貼照片（現在西安照一寸照一張六萬元，全市人口以六十萬計，需三十六億元）。現在決定開始全市人民自衛訓練，分成三期，普訓全市壯丁（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共二十五萬人，學校教職員學生均不得例外。原則上是任何人不得逃避的，可是誰也不相信這種訓練能夠普遍而公允。在西安較緊張的時候，一些銀行都在忙於疏散眷屬，有的計劃撤到漢中，有的計劃包機飛成都，還有些安全感特別重的人，要將寶眷送到昆明，要這些人來參加自衛訓練，恐怕有點近於滑稽。

攤派在西安市民是一種極為沉重的負担。救濟特捐一千五百億是政府規定下來的，不去說他。老百姓們負担一期又一期的壯丁安家費和最近市參議會所通過的「戡亂建國費」第一期二千一百億元，眞有點吃不消。尤其是這二千多億的戡建費，派得緊，派得兇，一家小門面動輒幾百萬，住家戶也要按所住房間多寡來出款。商家很多都拒絕交納，可是市當局表示決無考慮餘地，當然是要照繳不誤了。

因為關中產煤鹽白水、銅官被共軍攻佔或威脅，所以西安的煤炭價格，漲到極高。原來（下接十五頁）

法幣出關與流通券貶值所激起的波浪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陽春三月，物價的春潮洶湧而至。近來天空的飛機一直「嗡嗡」沒斷，然而關內却隔絕了半個多月的信息。東北恢復新聞檢查後，外埠記者相繼離去。平津報紙讀不到，連本地在朝要員的報紙都常開天窗。政府當局對晉京東北請老重申：「政府貫徹既定方針，確保東北，有辦法，有把握」。言猶在耳，而四平不保，永吉撤退，東北人民摸不清倒底政府葫蘆裏裝的什麼藥，却被嚴密地悶在葫蘆裏。

由幾位東北名流縉紳組成的所謂東北民衆請願團，在東北局勢岌岌可危的時候，飛京請願，攜有三項神聖的使命。（一）確定法幣流通券比率。（二）速派大軍，打通遼西走廊，組訓民衆。（三）救濟流亡青年。東北千瘡百孔，遍地狼烟，這三項建議，確乎都是當前急務，刻不容緩。政府如非因為手足無措而暈頭轉向，是應該早已見到了的。到現在問題越鬧越嚴重，顯示出政府的沒辦法，不是不想辦。譬如為了打通遼西走廊，才拆東補西地調來范漢傑兵團，作為給東北的一劑強心針。雖沒能如所期地銜接起寸斷的平瀋線，但是政府確已盡了心。如再增派大軍，要看政府如何抽調，不是派不派，而是有沒有的問題。組訓民衆，如何下手，眞沒人敢回答，要想和深入民間的共軍，去一爭短長，若非奢望，也是夢想。至於救濟青年，更是空文一紙，充其量也不過把他們編入軍隊。然而如此打算只會收到相反的效果。（如長春松北聯中的青年大批北流，即是一例。）所以後二節目，只是陪襯而已。其中「折騰」得最厲害的，是直接刺激人心的流通券問題。聽聽一般輿論，看看在瀋陽報紙所占的重要篇幅，就知道它的份量了。

代表們抵京後，奔波忙碌，謁見首要；連日與國行總裁張嘉璈研討的結果，對流通券問題，通過了三項原則：（一）准許東北與各地通匯，但匯款數額有一定限制。（二）流通券與法幣比值不得少於一比十。（三）法幣准許出關，自由使用。流通券不得在東北以外各地使用。同日財政部公佈了根據這三項原則而擬訂的流通券與法幣兌換率及行使辦法。二千元的大額流通券於月初發行後，物價的波動，只可看作物價上漲的序曲；財政部公佈了流通券的兌換率及行使辦法後，物價的狂瀾，才後浪推前浪地洶湧而至。由於局勢的窘迫，軍費的龐大支出，造成流通券的惡性膨脹，激起東北物價驚人的高潮。但是當局依然不顧輿情，一味地大量發行，來維持關外戰場的浩大開支。東北的特殊幣制，政府既沒能力，決心從根本改革，僅僅法幣出關，不但算不得喜訊，還會使東北的金融情況更趨惡劣。因為流通券不能入關，且繼續發行；同時關內外的匯兌不完全開放，兩地貨幣的流通沒法平衡，無異形成東北人民的雙重負担。流通券和法幣規定為「一與十」的比率，是流通券貶值的鐵證。所以近日來流通券和法幣兌換的黑市越法活躍，比值是「一比七」。市場上反應靈敏的黃金，黑市價格數日內由廿三萬一錢，一氣漲到五十五萬。銀元每枚由一萬三千元漲至二萬九千元；糧食一天四五個價錢，壓得人沒法喘氣。三月來主要物價的變動如左：（以流通券計）

	三月一日	二千元流通券發行後 三月七日	流通券法幣比值規定「一比十」後三月十九日
大豆每百斤	九萬元	十二萬元	二二萬元
高粱	廿五萬元	二七萬五千元	五四萬元
高粱米	卅四萬元	三八萬元	七〇萬元
大米	五四萬元	四七萬元	八五萬元
小米	三三萬元	四四萬元	七〇萬元
苞米麵	二四萬元	二五萬元	五八萬元
豆油	七八萬元	九〇萬元	一〇五萬元
兵船麵粉每袋	二六萬元	三〇萬元	四六萬元
利興粉	四五萬元	五四萬元	七二萬元
粉線五福布每疋	二五萬元	三〇萬元	四八萬元
20支天女紗每包	四八〇萬元	五六〇萬元	八四〇萬元
大象紙煙每條	三萬七千元	四萬二千元	七萬四千元
咖啡煙	三萬四千元	—	六萬八千元
紅光煙	六萬五千元	—	一二萬元

市上行情如此，旬日來上張一倍有餘；但是漲風迄仍堅挺，毫無回疲跡象。至於零售價格，荒唐得更令人難以置信。僅以每天賴以活命的高粱米來說，三天前每斤是五千元，十九號下午就漲到了九千元。其他，大米每斤一萬二千元，豆油每斤一萬八千元，豆餅每百斤由四萬漲到十一萬。所以家無隔日之糧的老百姓，已沒法活命，似乎已臨世界末日。人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問「高粱米多少錢一斤？」十四年的亡國奴生活誠然苦不堪言，但日子還沒這般難挨，苟延殘喘，瀕臨絕境，說不出他們的愁苦於萬一。眞是人心懷二，怨聲載道，可謂喪盡了民心。剛上任半個多月的董文琦市長，只可說時運不濟，一出師便弄得焦頭爛額，苦無應付方策。在萬般無奈中，弄到了四十多萬斤苞米麵，專配售餓癟肚子的貧苦市民；分量不足，要經過多少遍手續，不必說了；但費了大勁，每人却只限購一斤，配售價格還要三千四百元，這不是拿窮人開玩笑嗎？

正在這無止息的瘋狂漲潮中，瀋陽中央銀行，正式發行了流通券十萬、五十萬、一百萬元的巨額本票，流通市面。這不啻是火上潑油，市場的紊亂情形，更沒法收拾。十八日東北各省市縣參議會，及人民團體代表召開聯席會，商討「流通券災禍」的對策。情緒鼎沸中，展開了脣槍舌劍的激烈辯論。參議員李藻芳首先發言，他大聲疾呼地說：「這次請願團赴京請願，流通券是一個主題，我們怕的是什麼？我們怕的是流通券貶值。因為流通券一貶值，物價馬上就漲。現在政府公佈比率，改為「一比十」，物價首受波動，東北人通通吃虧。這與光復後政府發行流通券的原意相違背，實在是政府顧慮不週。將來恐怕東北局勢雖不敗於軍事，而將敗於經濟。我們應向政府提出抗議，流通券不准入關，法幣可以出關，試問政府是否有大量法幣出關使用？在東北還是用流通券，將來定要繼續貶值。因此，第一我們要求政府准許流通券入關，第二比率最少應照原比「一比一．五」，第三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流通券繼續發行。這是我們東北人的生死關頭，我們一定要力爭。」這一炮放得挺響，空氣的緊張熱烈達最高潮。第二位發言的張幼岐也力竭聲嘶地嚷道：「流

（下接十三頁）

國代和立委的選舉糾紛

褚光明

國代選舉糾紛與國大法定人數

（觀察南京通訊）

因爲國大開幕在卽，代表之爭到了最緊張的關頭。三月二十六日，簽署當選人一百餘人齊集選舉總事務所，要求發當選證書。自上午堅持到深夜。選總主任張厲生束手無策。

糾紛的現況是這樣：簽署當選人約六七百人，到京的有二百十六人。他們組織民選代表聯誼會，也和國大一樣辦理登記報到手續。各地通訊登記的人也很多。三個月來爭執的結果，中央已經讓了一步。卽對中央提名人可以不讓，不過還有一部份約二十幾名中央提名落選者，屬於小圈子以內，必須要當選，可是簽署當選人依然拒絕。對於友黨應讓的總額爲一百六十四名。中央堅持要讓，說這是政治問題，不讓勢將引起嚴重後果。簽署當選人認爲這是憲法問題，讓選以後將喪失憲政意義。中央令選總對於和黨內中央提名人爭執的簽署當選人先發證書。但他們不要，堅持要發同時發，不上個別擊破的當。中央通知應讓友黨者四十名於廿六日晉見蔣總裁。此四十人未去，說要召見全體纔去。張厲生表示所有簽署當選人證書日內卽發，但在廿六日僵持全日的情勢下，未見發出。傅曉峯，邱映光二人爭執中有幾支小插曲。職業和婦女簽署當選人向首都高等法院提起控訴，第一被告人是政黨提名人韋瓊瑩和李實平，第二被告人張厲生。廿七日上午開庭，張氏親自出庭，詳情已見報載。又天津民選代表趙遂初悄然來京，趙年六十餘，名片上初印「候補民主烈士」，旋又改爲「民主烈士候選人」，並宣稱政府如不守憲法，決抬棺材進國大，以老命相拚。又民選代表一〇二人簽署向法院以刑法一四六條控告張厲生變更選舉結果。法院開庭期未悉。

三黨負責人就糾紛事日來頻繁商談，無良好辦法。兩小黨代表報到者寥寥。一般看法，政府最後不得不讓步，由簽署當選人出席，再個別勸讓，有一個算一個。至於兩小黨缺額，如兩黨堅決爭執，祇有另謀解決之路。但是目前似乎已無解決之路，唯一的可能，祇有由兩黨另提一批綏靖區籍人，塡充綏靖區缺額。可是這個辦法劣績照彰，不成其爲辦法。不過事實上，兩黨對國代問題全力爭執，無非是一種姿態，其目的在求立委問題上不再吃虧。如果對此點政府能予以確實保證，兩黨可能讓步。因爲在此次大會中，兩黨代表佔小部份，反正無能爲力。

由於糾紛中幾百名代表未獲解決，民靑兩黨代表報到不甚熱烈。廿一日，蔣主席又電令當選代表之軍人暫勿來京，人數據估計有數十人。此外，各級黨部又通知可能有爭執的代表暫勿來京，所以報到代表不踴躍。廿六日止，僅七百六十四人。開幕，開議，及選舉總統時能獲得法定人數嗎？依憲法及選舉法所規定的代表總額爲三，〇四五人，已選出者二，八三二人。現報到者僅七百餘人。至廿八日止，充其量一千二百人。能否開會呢？這是一般的疑問。按憲法實施準備程序第八條：依憲法選出之國代達總額三分之二時，可以爲合法之集會與召集。現已選出人數已超過三分之二。惟另按國大組織法第十二條：國大非有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此處過半數如指總額而言，應爲一，五二三人，如指選出額而言，應爲一，四一七人。而以現時報到情形看，很難到此數。至於總統選舉，更需要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在二十六日國大籌委會招待記者席上，洪蘭友輕鬆地把這個問題巧妙地解答了。據稱：「國大召集，須有選出總額三分之二。至於開幕人數，按一般慣例，祇要有合法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此處合法人數，可以解釋爲召集合法集會的人數……」按照這一解釋。召集集會人數應有總額三分之二，卽二，〇三一人，而開幕人數祇要此數——卽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計爲一，〇一六人。照這樣說，廿八日晚止，一千二百人的報到是不成問題的。這個解釋是否牽強呢？好在條文是死的，解釋是活的。但集議人數和選舉總統的應有人數規定的很明顯，無法再解釋。所以開幕必然如期，而開幕後勢必用討論議事日程的預備會議來拖延時間等待代表，甚至有休會等待的可能。

洪氏在招待席上報告預算時說：「去年十二月底制定預算爲九百億，百分之八十以上用於招待費用。現在交通費都激增，預算顯然不敷。代表交通費實報實銷。至於代表公費，外傳若干，並不確實。每一代表公費僅一次發給五百萬元。」

國大除選舉總統與討論憲法外，有醞釀討論時局之說，在廿五日孫科宣佈競選副總統招待會上，有人問國大能否討論其他問題？孫氏答：「如果大會決定要討論，會外人不能加以阻止。」

山雨欲來的立委選舉糾紛

二十六日，新民報第一版出現一則廣告，係「中華民國民選立法委員聯誼會」之第一號通告，內稱「查立法委員選舉早經結束，當選證書尙未發給，而國民大會召開在卽，立法委員自行集會之期已迫，我民選立委尤有聯繫之必要。爰經集議成立中華民國民選立法委員聯誼會設通訊處於南京：凡未參加者請蒞臨或通訊登記，俾資聯繫。」這個通知，顯然是立委選舉糾紛卽將爆發的一個信號。

支持聯誼會的人承認立委選舉糾紛勢難避免。渠之估計，未來糾紛中的立委數，不下一百人。其情形與此次國代糾紛並無二致。如中央對國代糾紛有合理解決辦法，立委糾紛可以循例解決。假如國代糾紛不能解決，遷延下去，兩個糾紛性質一樣，可能新舊合流。另一主持人談稱，此一通告發出，將使糾紛中之民選國代蒙受不利影響，因政府多一顧慮。不過此事係出於偶然之錯誤。渠等原計劃將此通知刊登中央，新民及南京三日報及上海大公報，命人持稿至新民報估價。此人隨卽忽忽赴鎭江。新民報乃遽予刊出，以致較原定計劃早三日云。筆者應於此處指出，民選國代及民選立委兩聯誼會設於同一地點，卽南京日報亦卽鍾南中學內。附帶指出：南京日報社長亦卽鍾南中學校長，又係同一人，喬一凡先生。喬氏係蘇北區域立委候補第一人。

關於立委競選的情形是這樣，總額七百餘名，除去地方當局、民靑兩黨及一部無黨派名額而外，中央所能決定的名額最多祇有一半，三百數十名。其中，一向由孫科氏領導的舊立委（不包括去年四月按比例分配法參加的民靑兩黨立委）提名候選人有七十餘，另一競爭行憲後立法院長者。如衆所知爲陳立夫氏。然而準備支持陳氏的競選人，資歷與聲望不能與舊立委相駁，在中央審查會，大多不能通過。僅能獲得候補候選人資格。至於獲得通過之正式候選人總數，雖能超過舊立委提名數，但就變

（下接十五頁）

哀悼許季茀先生

吳世昌

昨天結束了這學期的功課，今天下午只須去把學生考了，把卷子看完，便可以有六個星期的復活節假期。聽說愛西施河兩岸，和瑙拉姆公園區附近，正是芳枝茁茂，繁花如錦的好春天氣，我還沒有功夫去看看。但就在今天早飯時，得到一個最壞的消息，許季茀（壽裳）先生被刺去世了。我妻在信中說：『兇手是一個他曾經用過的花匠，廿一歲，台北人。此人偷了他家幾次，最後一次被許先生發覺了，拿東西擲他，他即一不做，二不休，將刀刺了四下。一代學人，就此離開人世。我為了這事，難過得很』

我最後一次看見許老先生，是民國卅五年春天，彷彿也是這個時候，在重慶上清寺牛角沱的街上，他正在接洽復員東下的交通，似乎很忙，精神很矍鑠，原想和他長談一次，但他是住在歌樂山的，進城來的時間須用鐘點計算，就無法和他多談。三十五年秋天，我乘中大最後一只復員船東下，八月廿一日到校後，他從台灣打來的兩個電報和兩封長信已經在南京等了我一個多月。我這才知他是去台灣任臺灣編譯館館長的。這當然因為他是陳公洽先生的老朋友，但當時要請一位精通日語、學術界有聲望、而又不辭勞苦、富有青年朝氣、有開拓事業的魄力的老學者，國內恐怕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以我和他的關係而論，他原可以不必事前徵我同意，逕把旅費匯來，並且事前通知彼時臺灣長官公署駐滬辦事處代訂機票等等。但我因為東下太遲，竟辜負了他的一番厚意。去年年初台北事變，知道他平安無事，十分忻慰，不想他這次竟遭到這樣的慘死。

關於他的去世，我到此時為止，連日子地點都不知道。我妻給我的消息，大概她是從報上看來的。對於臺灣人的性格，我承認毫無了解。以他平日為人的忠厚誠摯，丁寧周至，在台北事變事他安然無恙，毋寧是當然的。但是奇怪得很，我常常把他的不幸和近來別的學人的不幸聯想在一起。我知道，在事實知道得這樣少的時候，極不應該如此聯想，我怪我自己這種糊塗的情感毫無根據。我寫信到國內在臺灣的朋友，希望知道些詳細的消息，證明我的聯想完全錯誤。

我認識許老先生是在北平，他任平大女師院長時，有一次和新婚的唐立厂先生在中山公園春明館外草地上吃茶，是芍藥盛開的時候，他和羅膺中先生在一起散步，我的印象是他在和煦之中帶點嚴肅。這也許因為那時平大女師院在風潮之後，經他接長認真辦理，大為安定，故而有此感覺。但在北平時我並不常常遇見他。廿六年秋，我從北平逃出來，因為北平研究院的史學研究所搬到西安，我在十二月趕到西安。那時北平的師大、平大和天津的北洋也在那裏成立西安臨時大學，他是校務委員。廿七年一月，我到陝北邠縣去調查大佛寺的唐代石刻，二月回西安，研究所的同事何樂夫先生說，許季茀和黎劭西兩位先生都來過了，因為臨大人沒到齊，要我們去幫點忙。我就是這樣開始教書生涯的。西安臨大因戰事搬到陝南城固，改為西北聯大，北平研究院的史學研究所簡直變成了她的附庸。

我和季茀先生同事一年半，才能親接他的謦欬。城固是個極小的山城，幾乎天天見面，初去時物價低，生活尚裕，那地方毫無可以娛樂的地方，許多同事就打打小牌，吃吃館子以為娛樂。但是許老先生從不愛打牌，也不大吃館子，他和許多聯大的青年教職員住在一起，在院子裏拼起三張大方桌子，每天下午四點鐘，脫下長袍和他們打乒乓球。那時大家都自己僱一個廚子做飯，他却和那些青年人組織一個「飯團」，後來生活逐漸不易，許多同事也只好放棄「小廚房」而紛紛組織飯團。他是聯大的老輩，但最喜歡和青年人在一起，毫無老輩常有的「老氣」。見了面必先伸出手來和人握手，訪客告辭，他一定先替他取下大衣，幫他穿上。城固的天氣很壞，雨季，泥濘，他在鞋子外面紮上一雙本地的草鞋，健步異常。（聽說後來有一位年輕的「當局」，却有包車，學生吃不飽，把他的車子燒了。）他的字，別有風格，最負盛名，不但以楷書寫隸篆，且以楷書寫金文甲骨文，頗有晉唐人風致，而有時則枯如瘦金體。同事同學向他索書的，有求必應。當時聯大同事的家中，幾乎家家牆上都貼了他的字。他的消遣，除了打乒乓球，就是寫字。現在矗立在城固郊外博望村張騫墓前的那塊「重修漢博望侯張騫墓道碑記」的碑陰，便是他老先生親手書丹的一整篇「漢書張騫傳。」

但他並不閒，那時他除教書以外，又是校務委員兼文學院長，後來改任法商學院院長。這個學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她的前身又是北京俄文法商專科學校。這個學院先天的有一個「俄」字，後來也還保留一些俄文課程，因此神經過敏和別具肺腑的人物（當時中國還求和德義法西斯政府宣戰），却不免對她「另眼相看」。而教部派到城固參與校政的大員，已不稱為「先生」，而呼為「同志」。有一位「同志」，經常帶着手槍，口袋中裝了子彈，對於他所看得不順眼的有些教授，竟下流到在許多人前面，掏出一把子彈來，嘻皮笑臉的問道，『花生米吃不吃？』這位電影檢查員出身，「留英」而不會說半句英語的「同志」，後來畢竟完成了他的「傑作」，把西北聯合大學解散，改成在他認為清一色的西北大學，最後在臨行時還對他的朋友說：『我是一架轟炸機，現在任務完畢，安然返防。』那時有一些學生，在這位同志的「循循善誘」之下，也都有了「自衞」手槍。北平帶來的純良學風，只好退避三舍了。而許老先生，這時也已應了中英庚款董事會聘為研究講座，離開了城固。接長法商學院的，便是那位「同志」。正如同許老先生以能書著稱，他以麻將能手著稱於西北大學。

這些事我是到後來才弄清楚的，因為那年（二十八年）的暑假，我被學校派到在蘭州舉行的甘肅全省中等學校教員講習會去作短期講演。九月初在蘭州看報，見到西北聯大改為西北大學，九月底經西安回來，經過漢中時見許多同事都向西安去，許老先生也在內。那些有手槍的學生反對許老先生，當然是奉命的，理由是許老先生是若干年前「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委員。聽說還有鉛印的傳單，但是在城固沒有一個人見到，而當時的教育部却有。（我那時想，假如當時蔡孑民先生也在西北聯大，一定也遭反對，因為他也是「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委員。）

我回到城固以後，雖然仍舊教着書，但眼看着常常有同事走，心中十分難過。許老先生先到那時還在雲南澂江的中山大學，後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他到成都華西大學，他從雲南來電要我去接他的課，我便於十二月底離陝入川，到成都那天是他自昆飛蓉的次日，我第一次嚐到他從飛機上帶來的雲南橘子。以後我輾轉粵桂，很久和他沒有見面。三十三年春，我因奔先兄之喪自昆飛渝，從樂山回渝時，從小龍坎跑到歌樂山，和他作一次長談。以前我和他所談到的，都是文史方面的種種問題，那一次談的却全是民生和國事的前途。他說：『敗是敗不得，勝了也是不得了』。他告訴我許多馮玉祥自川西去勸募獻金回來講給他的故事，足以證明那時的政治已經病入膏肓，軍事面臨極大危機。這是四月初的事。四月底我正要回桂林，重慶的朋友對我說，『長沙又吃緊了，不如在重慶罷』。我當時還很樂觀。我說『長沙怕什麼？不是日本鬼子已經三進三退了嗎？』但我回桂林的第十五天即被「緊急疏散」，接著在桂貴兩省山區中逃了半年難。在苗區中沒有飯吃，天

包華麗夫人逝世一百年

孝隱 凌卓女士

今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正是包華麗夫人 Madame Bovary 逝世一百年的紀念日。這是在世界文學界很令人記憶談論的一件事。

凡是對於文學稍有興趣與常識的人，沒有不知道佛祿培爾 Flaubert 這部小說名著名叫包華麗夫人的。但是關於包華麗夫人索隱的歷史，就知道的較少，或者可以說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包華麗夫人究竟影射何人？這一問題的爭論，在這部名著出世之時，甲是乙非，莫衷一是。經過長時期的考證，才公認無疑她就是顧居麗女士 Adelphine-Veronique Couturier。

顧居麗女士生於一八二一年。在一八三九年八月七日嫁與一位斷絃的醫生名叫德乃馬 Eugene Delamare 爲妻，她那時還不滿十八歲。

她是一位浪漫、閒蕩、而喜裝飾的人。自出嫁不久，就欺騙了她的丈夫，而且負債累累。結果她於一八四八年三月六日——一世紀前的今日——服毒自殺。她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遺下一女，名叫 Alice-Delphine 年剛六歲。在她逝世一年半之後，她的丈夫也服毒自殺了。這便是眞牌包華麗夫人的歷史。佛祿培爾這部小說的主人翁，所指確有其人。其人就是顧居麗女士。

但在佛祿培爾本人曾堅決的反對是影射這位女耶的，而且他堅決的否認他這部小說有任何實際人物做背景的影射：

他於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八日寫給向德比女士 Melle Leroyer de Chartepie的信中說過：「包華麗夫人這書沒有一點是眞實性的。這是一部完全憑空捏造的歷史。」

他於一八五七年六月四日寫給蓋爾多Cailleteaux的信中又說過：「沒有任何模型人物放在我面前的。包華麗夫人這書是一個純粹的揑造。在這書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完全由幻想來的。就是 Yonville-L'Abbaye 這個地名，實際也不存在的。Rieulle 也沒眞的有這處地方。但這是免不了在 Normandie（法國西北境）的人們因這些類似的地名發生了很多的猜想。我是另有幾種人的性格在那裏描寫的，但反而沒有描繪的十分逼眞。」

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四日，在佛祿培爾及他一班朋友所刊行的日報 Journal上，Goncourt 弟兄們又曾有過這樣的記載：「我們與佛祿培爾閒談。……談到包麗華夫人這部書。佛祿培爾向我們承認他影射了一個，惟一的模型在那裏描寫。這人離現實很遠，是一個古代的軍人。這軍人放縱浪蕩，常拔出劍來威嚇他的母親，詐取銀錢。他常穿靴子、皮褲、戴着巡警的帽子去 Lalanne 馬戲班內行刼。……」

幾天後，即三月二十日，佛祿培爾給高禺夫人 Cornu 寫信又這樣說過：我重三複四的說明，世間人們總有很多無中生有的猜想。當我寫了包華麗夫人這部書之時，常有人來問我：「是××夫人吧？你願意描寫的是什麼？」我接到許多全不相識的人寫給我的信。其中竟有一位住在 Reims 地方的先生，寫來一信給我慶賀，說我爲他的不忠實的女人的事出氣了，報仇了！在 Saine-Ineerieure 所有的醫生都要來賞我的耳光。更可樂的是南非洲一位軍醫太太眞名 Bovaries，發音與我杜撰的這個名字 Bovary 完全一樣。這是我五年以後才發現的事。」

但這些都是佛祿培爾因爲孝道而發出的謊言。他是十分怕引起他母親的懷疑而傷他母親的心的。原來他所描寫的包華麗夫人的丈夫德乃馬醫生是 Rouen 城中 Hotel-Dieu 醫院外科主任佛祿培爾老先生（就是他的父親）的一個往來頗密的學生。他母親常接待這學生並留這學生吃過飯。後來聽說他兒子所著這部書就是描寫這學生家中的醜事，她曾大加責問。佛祿培爾便堅決否認，並否認有影射任何人的事。他還種謊言，一直堅持到底。

這就是佛祿培爾否認題名 Madame Bovary 這部小說有影射任何人物的眞實性的原因，也就是爲這部名著作索隱的困難的所在。

自然，名著小說不必影射眞實人物的。但佛祿培爾這部小說中所描寫的Emma Bovary確是影射Adelphine-Veronique Couturier 這女子，已早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事。雖然書中大部份的人物是確有其人的，而且早經一一證實了的。雖然書中地名也很多是確有其地的，而且也早經一一證實了的。不過事物的眞實性，並不妨害著作大家的創造技能。佛祿培爾的包華麗夫人，也並不是祇藴了一番登記與註册的能事而已。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在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

天吃南瓜，瀉肚子，軍隊常在我前面跑，日軍在我後面追也追不上，於是我記起了許老先生的話：「這樣子簡直要垮，簡直要垮！」我現在又記起了他一手摸着白鬚，嘴裏咬着象牙煙嘴的神情了。

我所知道的許老先生的事蹟不多。但我在認識他以後的十來年中，我覺得他切親誠懇而認眞嚴肅。他在平大女師院長任內的認眞，是當時北平教育界所周知的。他的認眞不僅使女師院穩定下來，而且深得學生愛戴。在西北聯大任內，當時三校倉卒遷移，圖書設備極其簡陋，戰局又不穩定，學生常於課餘出去宣傳抗戰，但他不但督促學生讀書極爲認眞，而且自己也非常用功。我是他的後輩，但他常常不恥下問。他在華西任教時經常和我通訊討論問題。對於後輩的同事，也愛護如家人，認眞也如父兄之於子弟。可是有一特點，他常常是青年人一樣生氣蓬勃，决無老氣。他和章太炎是在師友之間，留日時與周豫才先生昆仲，同時，與豫才先生交往尤密。以章氏學派而論，他應該是古文學家，以豫才先生的交誼而論，他受今文學家的影響也當不少。但他爲學不泥師說，不墨守任何一家。更不像若干時賢，抱章氏之餘緒，嘆人心之不古。甚至於章氏非卜辭，則跟着欲「理」甲骨文字之「惑」，章氏講古音，便從而排斥科學的音韻學。他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甚久，任江西教育廳長多年。晚年治史學，文字學，傳記文學，每每不惜從頭做起，不知老之將至。他的稿子發表的很少。我只記得戰時重慶出版的「讀書通訊」上有他關於傳記文學和文字學的一些論文，似乎都是臨時應人索稿而作，求發表的手稿一定不少，希望國內的朋友能收集編印出來。此外，他大概還保存不少魯迅的手扎，我想這和他自已的手蹟一樣值得影印流傳，——他的手蹟，不論短扎長信，大都是筆筆不苟的楷書。即以書法而論，既沒有鄭孝胥的霸氣，也不同沈曾植的蒼勁，別有清挺靈秀，運乎鈎勒之間。我希望他的在台北的朋友，如李季谷，林本儒諸先生，能就近担任起這一份編集的工作。

卅七年國父誕辰之夕。寫於牛津錢學來路寓廬